

全球對話

GLOBAL DIALOGUE

16.1

一年出版三期, 以多種語言刊出

與Abdie Kazemipur 談社會學

Nazanin Shahrokni

Nazanin Shahrokni
Reyhaneh Javadi
Esmail Khalili
Zohreh Bayatrizi
Aghil Daghighaleh
Shiva Alinaqian
Nafiseh Azad
Maral Latifi
Mahbubeh Moqadam
Fatemeh Moghadasi
Ladan Rahbari

重構伊朗社會學

Karen Shire
Heidi Gottfried
Rina Agarwala
Ashwin Kumar
María Camila Vega-Salazar
Carolina Moreno
Suelen Castiblanco-Moreno
Javier A. Pineda D.
Lynn Yu Ling Ng
Yunhui Ye
Anju Mary Paul
Mustafa Yavas
Sejin Park
Feng Xu
Tsz Chung Lai

勞動遷移的 政治與社會經濟學

議題開講

> 戰爭作為糾纏的累積: 加薩案例研究

MAGAZINE



International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isa

第16卷/第1期/2026.04
<https://globaldialogue.isa-sociology.org/>

GD



> 編輯的話

本期《全球對話》邁入第 16 卷，迎來了一個既有傳承、也有新意的起點。在此，我們要感謝 Carolina Vestena 與 Vitória Rodriguez 過去三年的辛勤付出，他們的奉獻精神、細膩的編輯與批判性視野，是雜誌走過這段全球社會學動盪時期的關鍵力量。我謹代表編輯團隊向兩位致以最深切的感謝。同時，我們也很高興地歡迎里斯本大學學院的研究員 Marcia Rangel Candido 加入。Marcia 擁有豐富的編輯經驗，對公共社會學充滿熱情，也具有跨國比較的全球視野，必將為雜誌帶來深遠貢獻。

前一期特輯我們致敬了《全球對話》創刊編輯 Michael Burawoy 在思想、政治及人文遺產；本期則回歸常規架構，直接回應形塑當前歷史時刻的兩大急切關懷：伊朗的現況以及勞工移民相關的全球轉型。

本期以對話社會學專題揭開序幕，刊載了 Nazanin Shahrokni 對 Abdolmohammad (Abdie) Kazemipur 的專訪。訪談反思了關於國家社會學的辯論、社會變遷、聖俗之際，以及當今形塑伊朗社會學的核心探問。

隨後，是由 Nazanin Shahrokni 與 Reyhaneh Javadi 精心編輯的「再思伊朗社會學」專題。該專題聚焦於在政治壓迫、思想審查與深刻的文化爭議的環境下，進行社會學研究所面臨的張力與悖論。從社會學的公共相關性、該領域的（飛）制度化問題，到教學的私有化、族群問題、性別研究的抗爭以及批判性研究的種種限制，本專題對伊朗社會學今日所面臨的挑戰，提供了多維度的觀察。此外，專題中還包含一場由散佈各地的學者參與的動態圓桌會議，共同勾勒出關於伊朗及來自伊朗的知識生產圖景。

當今伊朗再次成為全球頭條——且往往被框架在選擇性的敘事、地緣政治的簡化或狹隘的安全視角中。在此時，與紮根、公共且具備全球視野的社會學觀點接軌便顯得至關重要。在主流媒體流傳的影像之外，伊朗社會的特徵是複雜的政治抗爭、生機勃勃的學術傳統、賭上尊嚴的日常奮鬥，以及不斷變化的國家權力與社會動員模式。要理解這些動態，就需要傾聽那些在伊朗、針對伊朗、並與之合作的學者的聲音，他們能夠將當前事件置於壓迫、反抗、知識生產與社會轉型的更宏觀的歷史當中。儘管本專題並非致力於分析最近期的事件，但它極有助於提供一種更廣泛並具有歷史脈絡的理解。

第二個主要專題為「勞動遷移的政治與社會經濟學」，由 Karen A. Shire、Heidi Gottfried 與 Rina Agarwala 共同編輯。本專題探討了我們時代的一個核心議題：勞工移民在全球資本主義重組中的核心地位。從印度的「安全且有序」流動計畫、到連結委內瑞拉與哥倫比亞的全球照護鏈，再到中國、新加坡、杜拜與柬埔寨的移工體系，這些文章展示了不平等、性別、族群、邊境與國家權力如何交織，進而產生新型態的不穩定性，以及主體能動性與反抗的新可能。

在議題開講中，本期以 Guilherme Leite Gonçalves 對加薩戰爭的深刻分析作為結尾。他將這場戰爭解讀為一種糾纏式積累（entangled accumulation），其根源來自於遠超戰場以外的政治、經濟與殖民動態。

透過本期內容，《全球對話》重申對於公眾及全球社會學的承諾，致力於透過在地化、多元且對話性的視角來分析當代進程。我們希望在此匯集的反思、辯論與研究，能在這個由不平等、暴力與流離失所形塑的世界中，拓寬對話、強化網絡並開啟新的探問同時，也為邁向更公正地未來的反抗、批抗性想像與集體努力貢獻力量。■

Breno Bringel，《全球對話》編輯

> 《全球對話》以多種語言發佈於[官方網站](#)。

> 投稿請寄信至：
globaldialogue@isa-sociology.org

 International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GLOBAL
DIALOGUE

> 編輯團隊

主編: Breno Brangel.

助理編輯: Marcia Rangel Candido.

副編輯: Christopher Evans.

執行編輯: Lola Busuttil, August Bagà.

顧問: Brigitte Aulenbacher, Klaus Dörre.

區域編輯團隊

阿拉伯世界: (黎巴嫩) Sari Hanafi, (突尼西亞) Fatima Radhouani, Safouane Trabelsi, Siwar Harrabi, Ahmed Jemaa.

阿根廷: Magdalena Lemus, Juan Parcio, Dante Marchisio.

孟加拉: Habibul Haque Khondker, Khairul Chowdhury, Bijoy Krishna Banik, Shaikh Mohammad Kais, Mohammed Jahirul Islam, Helal Uddin, Masudur Rahman, Rasel Hussain, Yasmin Sultana, Md. Shahidul Islam, Farheen Akter Bhuian, Ruma Parvin, Arifur Rahman, Md. Nasim Uddin, Alamgir Kabir, Taslima Nasrin, Suraiya Akter, Nusanta Audri, Ekramul Kabir Rana, S. Md. Shahin.

巴西: Fabrício Maciel, Andreza Galli, José Guirado Neto, Jéssica Mazzini Mendes, Carine Passos.

法國/西班牙: Lola Busuttil.

印度: Rashmi Jain, Manish Yadav.

伊朗: Reyhaneh Javadi, Niayesh Dolati, Elham Shushtarizade, Ali Ragheb.

波蘭: Aleksandra Biernacka, Joanna Bednarek, Sebastian Sosnowski.

俄羅斯: Elena Zdravomyslova, Daria Kholodova.

台灣: 李宛儒, 周芸瑄, 郭志豪, 黃翊碩, 林韻柔, 呂道詠, 簡芊楹, 廖宇雯, 李妮

土耳其: Gül Çorbacıoğlu.



在與Abdie Kazemipur的社會學談話中，Nazanin Shahrokni 和他討論形塑伊朗社會學那些不斷演變的問題。



重構伊朗社會學則探討在壓迫環境、學術審查及文化衝突的情況下從事社會學研究的拉扯。



勞動遷移的政治與社會經濟學的專欄中，討論勞動移民在重新組織全球資本主義的過程中所扮演的核心角色。

封面圖片: Hans-Peter Gauster, 來自Unsplash。



Global Dialogue由SAGE贊助

> 目錄

編輯的話	2	> 勞動遷移的政治與社會經濟學	
> 社會學對話		勞動遷移的政治與社會經濟學：	
特殊性的拜物教，與神聖世俗化：		初步介紹	
專訪 Abdie Kazemipur		Karen Shire，德國；	
Nazanin Shahrokni，加拿大	5	Heidi Gottfried 和 Rina Agarwala，美國	30
> 重構伊朗社會學		社會學領域對移民挑戰的貢獻	
在壓迫與連結之間：		Rina Agarwala，美國	33
透過伊朗視角重構社會學		印度國家機器如何想像與落實安全且有秩序的移民	
Nazanin Shahrokni 和 Reyhaneh Javadi，加拿大	8	Ashwin Kumar，美國	35
伊朗社會學學會與		跨越國界的關懷：	
非制度化的制度化之轉變		移民至哥倫比亞的委內瑞拉女性	
Esmail Khalili，伊朗	11	María Camila Vega-Salazar, Carolina Moreno, Suelen	
在政治與營利之間：		Castiblanco-Moreno, 和 Javier A. Pineda D.，哥倫比亞	37
伊朗的私人社會學課程		流動發展主義式的中國和新加坡移民照顧勞動力	
Reyhaneh Javadi 和 Zohreh Bayatrizi，伊朗	14	Lynn Yu Ling Ng 和 Yunhui Ye，加拿大	39
伊朗的族群性：當地社會學所迴避的問題		杜拜對非西方外籍人士的獨特吸引力	
Aghil Daghighaleh，美國	17	Anju Mary Paul, Mustafa Yavaş	
處境中的生命與知識之爭：		和 Sejin Park，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41
重奪伊朗性別研究		中國教育移民的本土、海外與歸國歷程	
Shiva Alinaqian，伊朗	20	Feng Xu，加拿大	43
重重限制下的伊朗社會學研究：圓桌論壇		柬埔寨成衣業移工：危脆性與抗議	
與談人：Nafiseh Azad, Maral Latifi 和 Fatemeh		Tsz Chung Lai 和 Kaxton Si，香港	46
Moghadasi，伊朗；Mahbubeh Moqadam，美國；		> 議題開講	
Ladan Rahbari，荷蘭；Reza Sohrabi, Nazanin Shahrokni		戰爭作為糾纏的累積：加薩案例研究	
和 Reyhaneh Javadi，加拿大	22	Guilherme Leite Gonçalves，巴西	48

「雖然國家或區域社會學理所當然地去挑戰主流典範，但它們也可能複製了自己所反對的排他性——例如將特定脈絡本質化，或僅僅是以一種普世性取代了原有的普世性。」

Abdie Kazemipur

> 特殊性的拜物教, 與神聖世俗化: 專訪 Abdie Kazemipur



| 圖片來源：Abdie Kazemipur。

近年來，關於全球社會學知識生產動態的辯論愈發激烈，大眾對於「國家社會學」、「南方理論」及「區域傳統」的興趣也與日俱增。伊朗為這些討論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正如本篇訪談中與 **Abdolmohammad (Abdie) Kazemipur** 教授所探討的內容。Kazemipur 教授目前擔任卡爾加里大學社會學教授暨族群研究系主任，並曾任加拿大社會學學會會長。他近期的研究探討了現代伊朗境內神聖與世俗的交匯，以及移民如何重塑其社會地景。在這場廣泛的對談中，Kazemipur 教授反思了伊朗社會學的現狀——包括其面臨挑戰、所做出的貢獻，以及對「植根在地、接軌全球」學科特質的追求。本次訪談由西門菲莎大學國際研究副教授 **Nazanin Shahrokni** 主持。

Nazanin Shahrokni (NS)：許多社會學家都曾挑戰「普世」社會的概念，指出長期以來被視為普世的理論，實際上是根植於歐美經驗的特殊傳統。為了回應這點，學界轉向「特殊性」——透過國家社會學、區域方法論以及南方理論，試圖將另類的認識論推向前景。你如何看待這種轉向？在伊朗語境下談論「國家社會學」又意味著什麼？

Abdie Kazemipur (AK)：我認為這種區分無論在描述層面或規範層面上都存在問題。雖然國家或地區的社會學確實能夠挑戰主流典範，但它們也可能重蹈自己所反對的覆轍——例如將特定情境本質化，或僅是用另一種普世主義取代原有的。如今反對普世主義已無爭議，但我們卻面臨陷入一種新「特殊性拜物教 (fetishism of the particular)」的風險。

首先，每個「特殊性」內部都包含多樣性。聲稱能代表其所有子範疇，其實是重蹈了普世主義的覆轍。例如伊朗與土耳其（皆未被直接殖民）就無法輕易地與阿爾及利亞、印度或埃及等前殖民地歸為一類；正如 Sari Hanafi 所言，即便在阿拉伯中東地區，東部與西部也有非常顯著的差異。

其次，將「國家社會學」或南方理論主要框架為對北方典範的反抗，往往更服務於以身分為中心的政治目標，而非認識論目標。這會推舉出一些象徵性人物，但其革命吸引力會隨著時間消逝。例如，Raewyn Connell 將 Ali Shari'ati 視為 1979 年革命前反對西方文化霸權的關鍵聲音；然而，他的思想影響力在革命後迅速降低，這說明身份主張或許能在政治動員方面發揮作用，但對於社會學知識的持續發展貢獻甚微。

>>

NS：既然您對「特殊性拜物教」有所顧慮，您是否認為我們應該徹底放棄「國家社會學」的概念？像「伊朗社會學」這類概念在分析上是否具有實際意義？還是說它反而可能強化了其試圖克服的認識論鴻溝？

AK：「國家社會學」確實存在，也應該存在，但不應作為理論的封閉領域（enclaves）。其價值並不在於主張擁有獨特的理論或方法，而在於提出植根於該社會具體情境的獨特問題。「好的」社會學始於定義明確且具有在地性的問題；而要回答這些問題，則需要動用所有可用的智識資源——無論是南方的、北方的、東方的還是西方的——而不應預設排斥任何一方。這類解答產生於思想與現實之間長期的協商過程，以及跨學術傳統的交流。因此，我們應實踐「理論不可知論」與「折衷主義」——擁抱來自多元傳統的概念，而非將特定理論神聖化或棄如敝屣。

NS：讓我追問兩個問題。您認為國家社會學的價值在於提出的「問題」，而非推進「獨特理論」。但正如女性主義社會學家長期以來所主張的那樣，並不存在所謂的中立立場：我們所提出的問題，受到我們所擁有的概念工具與分析視角的制約。主流典範甚至可能預先排除了某些問題被提出的可能性。從這個角度來看，國家或地區社會學不僅僅是關於提出在地問題，也關乎發展出替代性框架，好像新型態的探究成為可能。您對此會如何回應？

AK：我同意這樣的觀點，但我認為這種制約是雙向的。正如所謂的「普世主義」視角可能會限制我們提問的能力，同樣的，「在地」視角也可能預先排除了其他的探究路徑。這種緊張關係在女性主義研究中尤為明顯。雖然全球北方某些女性主義流派的普世立場，常使他們對南方湧現的另類問題與理論可能視而不見；但事實上，南方許多女性主義意識，也正是透過參與根植於北方的女性主義議程才得以成形。這正是為什麼跨視角、持續且積極的對話至關重要。

NS：延續剛剛提到的觀點，既然您強調國家社會學是通過其所提出的問題而形成的，那麼能否談談過去數幾十年來，有哪些問題與主題定義了伊朗社會學？

AK：伊朗社會在過去的五、六十年間經歷了天翻地覆的變化，這些變化形塑了社會學家所關注的問題。其中包括：革命前時期由國家主導的快速現代化和世俗化；1979年伊斯蘭革命期間，宗教勢力意外崛起成為強大的政治與個人力量，並動員了大約10%的人口；以及兩伊戰爭：這是20世紀持續時間最長的戰爭。

近幾十年來，我們見證了世俗化的雙重進程：其一是徹底摒棄宗教，或轉而擁抱一種去機構化、去儀式化、且擺脫聖職階級與神學束縛的個人化靈性；其二則是一種使宗教從屬於國家的世俗主義型態，這是兩者在激進的伊斯蘭化浪潮下強行合流後，所導致的非預期後果。

伊朗亦具有獨特的移民輪廓：它同時是主要的移民輸出國，也是主要的移民接收國。該國接納了約450萬難民（約占總人口的5%），同時約有800萬伊朗人生活在國外（約占總人口的9%）。調查顯示，若條件允許，超過半數的國民渴望移民，這使得伊朗成為同時研究「移出」與「移入」現象的罕見案例。

最後，為了回應體制性的性別不平等與文化父權，一場強大且真實的女性運動應運而生，重塑了該國社會運動的本質、規模與訴求。這些有趣且相互交織的動態——包含意識形態轉向、宗教變革、戰爭、移民以及性別問題——激發了伊朗國內及海外社群蓬勃的社會學研究，特別是在移民、身份認同、性別和社會資本等領域。

NS：在這樣動盪的歷史背景下，您認為當今伊朗社會學成長的最重大障礙是什麼？這些挑戰又是如何影響了哪些問題可以或不可以被提出？

AK：最大的挑戰在於政府對研究自由的打壓。研究社會問題的領軍人物 Saeed Madani 博士目前仍身陷囹圄；旅居法國的人類學家 Fariba Adelkhan 博士在獲釋前也曾入獄數年。還有許多學者被開除教職，即便如此，他們仍持續產出卓越的作品。

與此密切相關的是，國家與「政治」在伊朗人（包括許多社會科學家）的思想認知中始終佔據首位。這種對政治的高度關注，往往掩蓋了「社會」本身，限制了提問的類型與分析方向。其具體體現在，當國家無法或不願發揮預期功能的情況下，針對社群賦權或在地倡議的研究卻極為匱乏。

另一個障礙源於一種雙重弊病：一方面是對理論的過度迷戀——近乎拜物教的地步；另一方面則是缺乏理論導引的經驗研究，即 C. Wright Mills 所稱的「抽象經驗論（abstract empiricism）」。伊朗社會學需要更多以理論為導向、且兼具在地紮根與嚴謹概念的實證研究。

最後，伊朗社會學在很大程度上仍與全球社會學及比較研究脫節——即便與土耳其、埃及和沙烏地阿拉伯等在區域或歷史上具備可比性的語境，也缺乏對話。

話雖如此，新的機制正在將伊朗社會學與更廣泛的學術討論聯結起來。一群常駐海外、通常為第二代移民的年輕社會學者，為伊朗社會研究帶來了新的活力與好奇心。儘管他們的著作偶爾被浪漫化，但在向全球受眾轉譯伊朗社會現實、並提升該領域的國際能見度方面，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另一個方面是伊朗國內蓬勃發展的翻譯運動，它以驚人的速度將古典與當代社會學著作翻譯成波斯語。這極大地影響了當地的學術討論，並使伊朗學者能夠接觸到全球的討論——儘管目前多是接收，而非貢獻。

NS：這種翻譯運動確實讓人印象深刻，但它也反映出一種更深層次的不對稱性：翻譯的流向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單向的。在伊朗境外產出的著作——尤其是以英語形式創作的——會被翻譯成波斯語，但極少有以波斯語創作的社會學著作被翻譯往海外；而且在伊朗國內，對阿拉伯語、土耳其語、庫德語或其他地區的社會學著作的傳播也很有限。這種語言和認識論的失衡引發了更廣泛的問題。關於這一點，您如何看待伊朗在全球南方社會學，特別是在中東社會學的版圖裡，佔據什麼樣的位置？

AK：你說得對，這種單向流動對伊朗社會學並不健康。伊朗的社會學學會應致力於與區域內外的同行建立更具系統性、常態性的聯繫，這點對雙方都有利。

正如 Michael Burawoy 所言，國家社會學一如個人認同，是在關係中形成的，並透過與他者的互動來理解自身。用他的話來說：「我們不能再將特定的事物——無論是美國或法國、男性或殖民者——投射為普世標準。但我們也不能陷入孤立的特殊主義的泥淖之中。全球社會學必須建立在不同特色、不同觀點之間的對話。」

借用 Michel Foucault 的一句評論：社會學的未來存在於相遇的空間——在那些歐洲與非歐洲、西方與東方、北方與南方，以及各個區域內部多元的交匯並相互擾動的空間。伊朗社會學對這樣的未來的貢獻，取決於能否培養出一門根植於真實、且具備特定情境問題的學科：既不受困於進口的理論模型，也不淪為國家例外主義。■

來信寄至：

Nazanin Shahrokni <nazanin_shahrokni@sfu.ca>

> 在壓迫與連結之間： 透過伊朗視角 重構社會學

Nazanin Shahrokni, Simon Fraser University, 加拿大；
Reyhaneh Javadi, University of Alberta, 加拿大



伊朗的社會學知識生產正面臨困境，而這場研討會正是在這樣的時刻中誕生。伊朗社會學中的長期論辯，正是關於自身究竟應該在公共議題中扮演什麼樣的角色——批判者、社會危機的診斷工具，還是國家與社會之間的調解者。如今，這些討論的舞台卻大幅縮減。政治壓迫、支離破碎的公共領域封殺學術異見、經濟困境、全球制裁，以及嚴苛的移動與簽證制度，共同削弱並動搖了曾經支撐伊朗社會學的體制與智識空間。大學在日益嚴苛的政治條件下運作，研究經費匱乏，國際合作也更加困難。然而，學者們仍持續分析、紀錄並參與於伊朗的社會變遷當中，為伊朗社會學提供堅實的地基，促使其存續。

本次研討會的籌備期間，這片土地的動盪局勢已令人無法忽視。伊朗歷經的一系列危機，彰顯了學術生活與知識生產的脆弱性。2025年6月，以色列對伊朗發動了為期十二天的戰爭，打擊了該國境內的軍事及民用基礎設施。數月後，2026年1月抗爭爆發，卻遭到國家的殘酷鎮壓，數千名平民喪生。[伊朗社會學協會](#)指出，這些抗爭與國家的暴力回應，既非前所未有、亦非難以預料。協會警告，常態化的暴力威脅了社會團結與人類尊嚴。這使得

社會學變得更加不可或缺：危機的紀錄、其結構性根源的解讀，以及關於未來的公共對話之維繫，都仰賴社會學作為手段。

更糟的是，上述的艱困處境仍進一步惡化。本次研討會的相關出版品送印之時，美以兩國新一輪的軍事打擊，再次於全國各地不分青紅皂白地奪走平民性命。受害者包括超過100名未滿12歲的女學生，她們在南部小城 Minab 一所小學中遭受襲擊。這些轟炸摧毀了基礎設施，使得本就脆弱的制度環境更加惡化，並危及幾代伊朗社會科學家費盡心血建立與維繫的學術根基。

上述現象恰恰反映出的，正是伊朗社會學在如此環境中的必要性。學者們面臨多方壓力——國內的限制了學術自主權與公共辯論，而外部的軍事與經濟脅迫則進一步動搖了學術生活所依賴的制度根基。因此，本次研討會不僅探討伊朗社會，更反思社會學本身必須在何種條件下才能持續發展並發聲。

> 多次受襲的伊朗國內外學者和基礎設施

這些條件的脆弱性，也能反映在伊朗社會學學會 (ISA) 的「物理生存狀態」之下。學會位於德黑蘭大學的官方辦公室，長期暴露在國家規管的審查之下，使學會不斷承受著針對其自主性的種種壓迫。學會為爭取獨立且永久性的辦公據點而進行的努力陷入停滯，這進一步體現了社會學與公共生活的全面萎縮。制度上的不確定性，伴隨著眾多學者、翻譯人員及研究者被連番逮捕的事件，不僅是個人遭到摧毀，支撐著批判性思維的基礎設施也一同面臨瓦解的處境。在這種情況下，從事社會學工作往往伴隨著巨大的個人風險。這些壓力有其深遠的歷史根源：社會學長期被視為在意識形

>>

態上極其可疑，並反覆遭受伊斯蘭化、學科「清洗（Cleansing）」以及持續不斷的安全化管理。

這些矛盾延伸到了伊朗國境之外。伊朗裔美國學者及其他離散學者，在伊朗與西方學術機構中皆面臨著日益加劇的監控與移動限制；他們在彼此重疊的安全邏輯框架下艱難地穿梭，這些邏輯限制了他們的旅行與合作研究。在伊朗境內，這種帶有懷疑色彩的社會學氛圍在境外也愈發明顯。

> 意料之外的韌性

然而，這些壓力與意義深遠的轉變並行不悖。2025年 Shirin Ahmadnia 博士當選為伊朗社會學學會首位女性主席，這個事件引發了強烈迴響，這標誌著對於女性社會學勞動遲來的認可，同時也開啟了重構一個在歷史上由男性主導之體制空間的可能性——尤其在當前，社會學這門學科主要由女性學生支撐。這場選舉發生在體制岌岌可危之際，這本身就極具意義：即便結構日趨衰微，對能見度與發言權的新訴求依然不斷湧現。正是在這種緊張局勢之下，伊朗社會學磨練出驚人的韌性，從校園內部到私人研究機構，從讀書會到離散網絡，師生們正合力為思想與辯論拓殖出新的腹地。

> 本專題目標與啟發式指南

本專題的核心目標有二：首先，它旨在彰顯伊朗社會學所蘊涵的學術活力（Intellectual vitality），並揭示形塑其研究實踐的種種阻礙；其次，它將這些辯論拉升至全球層次，在權力分布不均的地緣政治中，重新定位社會學。作為一項具有啟發性的指南，我們提出「在伊朗的社會學（*Sociology in Iran*）」與「關於伊朗的社會學（*Sociology of Iran*）」之間的區分；這種區分並不是要劃定地理疆界，而是試圖指認出，形塑該領域的認識論、方法論與政治上的種種裂隙（Fissures），與其所描繪出的當前地景。

> 在伊朗的社會學與關於伊朗的社會學：跨脈絡的流動

所謂「在伊朗的社會學」，指的是在伊朗的大學、學會、私人研究機構以及非正式的學術網絡中，所形成的多元專業、教學與研究實踐。這不僅包括社會學知識的產出，也涵蓋了透過蓬勃發展的翻譯產業、公開講座、工作坊，以及在體制外支撐著社會學參與的半獨立教學空間來傳播知識。這些實踐是在資訊審查、監控、意識形態控制、經濟緊縮以及國際機構門檻——包含語言、名譽與地緣政治障礙——等條件下開展的。這些限制使得批判性研究充滿風險且發展不均，卻也催生出各種躍魚協作、教學和公共辯論的創新策略。

所謂「關於伊朗的社會學」，指的則是無論在國內或國外產出的，旨在理解伊朗——包含其社會組成、歷史脈絡與政治經濟學——的整套學術體系。這類研究大多在全球學術框架下流動，並受到主流學科受眾對其「合理性」的期待所形塑。儘管這些壓力促進了更廣泛的國際能見度與辯論，卻也可能邊緣化了那些源於伊朗內部的、特有的概念、議題的優先順序與特定的知識語彙。

至關重要的是，這兩種取向並非固定不變的範疇或對立的類別。儘管存在政治與制度上的阻礙，思想、檔案與方法論的敏銳觸覺依然在國境間流動。學者在其職業生涯中，常於這些立場之間轉換，而他們的研究成果，則會受到不斷變動的資源獲取管道、所受的限制以及受眾的轉變所交織的情境所影響。

> 舉世猜疑與制裁枷鎖

然而，在能見度、資源與體制認可方面，依然存在顯著的不對稱性。伊朗境內的研究者必須與審查、監管以及物質匱乏搏鬥；而身處境外的研究者，則面臨制裁體制、簽證限制，以及西方學術機構的規訓凝視。對許多離散學者而言，這意味著他們在兩地都陷入了被猜疑的處境——在伊朗受到監控，在北美與歐洲則受到嚴審——這都在實質層面影響了他們能夠研究、撰寫、分享哪些內容。

地緣政治進一步加劇了這些斷裂。美國的制裁使得身處伊朗的學者處境艱難，有時甚至完全無法參與全球學術網絡、繳納專業學會會費或參加國際會議。伊朗社會學曾是公共辯論的重要平臺，如今卻在經濟壓力與制度壓力下，連維持基本運作都舉步維艱。這些排除不僅限制了伊朗社會學的發展，也損害了全球社會學的完整性，使那些來自受到制裁、監控與結構性邊緣化的聲音被消音，甚至讓這樣的「缺席」被視為理所當然的。

> 認識論、方法論與體制性的重壓

本次研討會的論文從多個角度切入了這些困境。有些文章探討了社會學實踐背後的制度條件；有些則深入探討基本的認識論問題；而與 Abdolmohammad Kazemipur 的訪談，則將伊朗的辯論置於更廣泛的理論反思中，探討特殊性與普世性之間的關係。

Aghil Daghagheleh 與 Shiva Alinaqian 的文章追溯了關於族群和性別方面的認識論空白，揭示了一個由性別、族群和階級制度交織形塑的規範中心，如何長期以來支配著伊朗社會學，導致邊緣敘事與女性主義被迫邊緣化，甚至遭受質疑。這

>>

樣的排除不僅只在智識層面，也體現在制度中。正如 Esmail Khalili所指出的，伊朗社會學協會體現了一種「去體制化的體制化（institutionalization of non-institutionalization）」：這是一種特殊的組織狀態，即不斷努力地將社會學體制化的過程中，也持續對其造成破壞。他的分析凸顯了一種悖論：儘管該領域將大部分精力投入建立持久的體制形式，但這些努力卻是在一個限制實質自主性的環境中進行，並且進一步強化了它們試圖克服的限制。類似的緊張關係也出現在關於私有化的研究中：Reyhaneh Javadi 與 Zohreh Bayatrizi 證明了社會學的私有化最初被期待能夠彌補學術自主性的缺失，結果卻反而強化了新自由主義的商品化邏輯，將教育轉化為一種學位資格認證的市場，而非公共財。

在題為「重重限制下的伊朗社會學研究」的圓桌會議中，與會者對方法論困境的討論，將前述分析延伸到了研究的日常實踐中。從田野調查的種種限制、模糊不清的倫理審查制度，到被刑事定罪的威脅，與會者皆是了這種高度政治化的環境——無論是在伊朗境內，或是在研究伊朗的離散地與學術機構中——不僅形塑了哪些議題能被研究，也決定了哪些資料能被收集、存檔與傳播。

> 新興的轉型實踐與創新的參與模式

然而，本專題研討會也凸顯了在限制之中、以及對抗限制所開創的種種可能性。儘管在官方體制內遭到邊緣化，女性主義學者仍持續對性別、宗教和國家權力進行深刻的分析。關於族群的研究則挑戰了國族主義的正統觀念，強調必須將族群差異置於國家形成、主權運作以及日常抵抗的歷史脈絡中來理解。儘管伊朗社會學學會面臨不穩定，且必須仰賴公立大學或地方政府善意支持的窘境，但它仍持續為會議、出版品及面向公眾的活動提供平台。此外，私人及半私人的社會學課堂也催生出了混合型的教學空間，在抵抗與新自由主義再生產之間擺盪。在這些脈絡底下，社會學家們成功將限制轉化為方法論與概念上的創新。

綜合來看，這些研究貢獻描繪出了一片既充滿複雜、多尺度限制，又並存著多元且創新參與模式的地景。它們展現了社會學領域如何透過結構性壓力，與學者們所採取的靈活機智的實踐間的交互作用，而不斷獲得重構；學者們得以堅忍生存、靈活適應並積極參與其中。

> 邁向與伊朗同在的社會學

本專題研討會的目的不在於全面繪製伊朗社會學的地圖，而是將這些壓力置於更廣泛的學門問題框架之中進行審視。「在伊朗」與「關於伊朗」的研究所面臨的種種不穩定性，反映了全球南方的共

同命運：在權威治理、市場壓力與全球知識網絡的不平等參與中奮鬥。透過匯集這些論點，我們不只是在紀錄這些挑戰，也希望邀請讀者思考：這些經驗對於更廣泛的社會學學門提供了什麼樣的概念與方法論上的啟發。就此而言，伊朗社會學的故事，便成了社會學本身的故事：關於它的局限性、它的可能性，以及它為了對其所根植的社會負責，而持續進行的奮鬥。

因此，我們提出的是一種與伊朗同在的社會學姿態：這是一種根植於協作、互惠和反身性的參與模式。這種取向並非要消解「在伊朗」與「關於伊朗」社會學之間的張力，而是堅持在兩者的交織與跨越中進行探索。它主張伊朗社會學絕非處於全球學術的邊陲，而是處於核心位置。它不僅迫使我們重新思考社會學的全球發展路徑，更挑戰了長期以來主宰知識生產與流動的排除性體制。

這種立場拒絕將伊朗社會學僅僅視為一個「案例」，或受到外部檢視的「客體」。相反的，它肯定了伊朗社會學家所進行的學術研究、在體制中的奮鬥與方法論上的創新，這些都是對廣義社會學的重要貢獻。在當下伊朗的聲音被系統性地排除在國際論壇之外的時刻，建立一套「與伊朗同在」的社會學，既是迫切必要的，也是維護學科正義的使命。■

來信寄至：

Nazanin Shahrokni <nazanin_shahrokni@sfu.ca>

Reyhaneh Javadi <javadil@ualberta.ca>

> 伊朗社會學學會與 非制度化的制度化之轉變

Esmail Khalili，公民與社會文化研究所前成員，伊朗社會學學會副主席（2021-2025），伊朗



第六屆伊朗社會概念與批判性反思會議，2025年9月。圖片來源：Mohadeseh Ghazvini。

1934年，隨著德黑蘭大學的成立，社會學進入了伊朗的高等教育體系中。當時，畢業於索邦大學的 Gholamhossein Sadighi 於 1940 年開始在該校教授社會學。在發展初期，伊朗的社會學是一個規模較小且精英化的領域，深受法國知識體系的影響，並與巴勒維王朝的現代化國家建設工程緊密掛鉤。當時，這門學科主要在德黑蘭的學術精英圈內孕育，體制影響力有限，專業社群也相對狹小。

1979 年的革命以及隨後於 1980 至 1983 年間開展的文化革命，為學術界帶來了變革與擴張。新成立的伊斯蘭共和國對大學理系進行了徹底的改組：開除被視為意識形態上可疑的教職員、關閉大學以進行整頓，並將意識形態審查納入學術生活的每個階段。社會學與其他社會科學一樣，受到了嚴格的審查；整個學術思潮被肅清，課程大綱也被改寫，以伊斯蘭教義與革命精神為核心準則。

矛盾的是，1980 年代末至 1990 年代兩伊戰爭結束後的戰後重建期，伊朗的高等教育規模迅速擴張，社會學的招生人數也大幅增加。然而，該學科在制度上的增長，卻深植於食利國家（rentier state）的官僚與意識形態體制之中。職位晉升、研

究經費和系所的人事任命，與其說是取決於學術自主性或學術成就，不如說受制於政治忠誠度、人際網絡及對官僚體制的順從。儘管社會學系與學生的人數激增，但學術生活的品質，卻始終受困於「形式上的擴張」與「意識形態監控」的夾縫之中。

> 官僚順下的多樣化主流, 與異質並起的學術邊緣

在這種後革命時代的背景下，伊朗社會學變得日益分化。意識形態篩選、官僚形式主義，以及食利型大學（rentier university）的聲望經濟（prestige economy）交織作用，形塑出一個內部位置各異、有時甚至截然對立的專業領域。有些學者透過與官方意識形態掛勾的利益輸送管道（rentier channels）進入該領域，將政治忠誠轉化為權力資本，在寡頭是的學術網絡中佔據管理職。另一些人雖然在意識形態上不那麼堅定，但是出於務實利益的考量，依然擔任了官僚角色，試圖在體制的現行規則中尋求保障與晉升。

此外，還有一些堅定的意識形態信徒——無論是宗教、左派貨是民族主義者。他們將自己置於大學主流之外，將重心放在政治主張的宣示，而非持續的實證研究。而在學術核心全之外，許多在 1980

>>

年代的大清算中被開除的獨立研究者，儘管缺乏正式的體制頭銜，仍持續產出具有長遠學術價值的作品。

「大學邊緣群體」包括那些任職於研究機構或科研機構的人員，他們通常透過公開講座、出版品和線上論壇與更廣泛的受眾接觸。此外，還出現了一體制外的青年學者——其中有些人因法規限制而無法進入學術界，另一些人則是主動選擇迴避，他們仍與全球重要的學術思潮持續對話。伊朗的離散者則包含兩個截然不同的群體：一是在伊朗受訓但因政治禁令而無法回國的人，二是在海外出生長大、但其學術研究仍與伊朗社會緊密相關的人。最後，還有一群「身分追求者（identity seekers）」：對這些畢業生而言，社會學與其說是一項持續的學術追求，不如說是一種獲取個人或象徵性認同的方式——它提供的是認可、地位或歸屬感，而非持續性的學術貢獻。」

> 歷史遺產

這種層次分明且破碎的專業地景，早在伊朗社會學學會成立之前便已存在，卻決定性地型塑了該學會的文化與內部政治。從官僚式的效忠到激進的獨立、從全球性的學術交流到純粹的個人認同，這些截然不同的價值取向並存於世，使伊朗社會學學會的組織生活同時顯德多元性而緊張。

這些歷史遺產為一種可稱為「非制度化的制度化（institutionalization of non-institutionalization）」現象奠定了基礎：在這種文化中，學術活力的表象，往往比實質性的知識生產更重要。

> 在形式與實質之間

若以正式基準衡量，伊朗社會學學會在制度化的進程中已取得顯著進展：會員人數持續增加、年度會議規模不斷擴張，且在公眾辯論中的能見度也日益提升。學會邁向專業組織體制化的關鍵一步始於 1991 年。當時，十七位主要受訓於歐美的伊朗社會學家共同創立了該學會。在發展初期，學會建立了更結構化的內部組織：除了行政（例如日益完善的會議籌辦與刊物出版）外，它還設立了對應社會學各分支領域的工作小組。然而，其中許多小組的運作，至今仍缺乏明確的重點或目標。

由此產生的是，一個可被稱為「非制度化的制度化」的悖論。科學學會的運作，往往更注重形式而非實質：透過研討會、工作坊和會議來「展演」知識生產，成為了衡量正當性的標準，而真正具有洞見的產出反而退居次要。就此意義而言，他律性的成形不僅僅是透過對外部力量的依賴，更體

現於那些模擬智力勞動之實踐的常規化——這些實踐模擬了勞動過程，卻未必能產出實質成果。

> 從整合鞏固到慣例僵化

從 2000 年到 2015 年之間是一個相對穩定與整合的時期，伊朗社會學學會在此期間確立了其學術與社會信譽。然而，隨後的幾年迎來了世代的大換血：許多資深學者不再積極參與，而新進學者——往往在受限的學術環境中摸索——則面臨系統性培訓不足、難以融入專業網絡的困境。儘管量化增長仍在持續，學會的學術核心卻趨於衰弱。在穩定期所建立的體制規範與例行公事變得根深蒂固，形成了一種曾經有效、如今卻對變革產生抗性的認同狀態。

伊朗社會學學會早期的組織藍圖，與其說具備明確的規劃，不如說更仰賴的是默會知識（tacit knowledge）：即創會成員間非正式的習慣與假設。該學會並未依據伊朗的實際情況發展出相應的結構，而是在很大程度上照搬了歐美專業協會的外在形式。這種模仿雖然讓學會看起來像是個正式組織，實際上卻缺乏能夠穩固形成組織身份的反思性調整或成文規範。結果導致學會至今依舊缺乏闡明其學術使命、倫理與科學準則以及長期願景的基礎資料。與學術生活核心議題相關的討論——如民主化、組織倫理或各工作小組間的分工——始終未能成熟發展。

由於缺乏成文規範，伊朗社會學學會的運作長期依賴不成文慣例與個人化決策。它與其說是一個現代體制，不如說更像一種混合體：雖具備正式組織的外殼，卻缺乏制度長久存續所需的反思性自覺（reflexive self-understanding）。這種「制度化進程中的非制度化」在其民主程序中清晰可見：成員極少針對學會的發展方向進行實質的討論，學會本身也未被成員們廣泛性地視為一個集體的學術與組織志業。

> 聲望重於學術嚴謹與專業責任

與此同時，學會內部也充滿了各種矛盾。伊朗社會學學會雖然表面上遵循組織活動的各種常規程序——如開研討會、辦選舉、出版刊物——但這些往往只剩下形式，而無法真正實踐一個學術團體該有的核心目標。與其針對理論、方法或研究的先後順序進行匠時的專業辯論，他們反而把競爭的力氣都花在對於聲望、能見度與身分認同的追求上。近年來，激進主義與對於身份認同的追求的衝動變得更明顯了，這雖然讓學會在社會上更出名、更有能見度，但有時卻掩蓋了最根本、也最艱難的任務：那就是建立一個經得起考驗的專業體制。

這些動態主要圍繞著意識形態、名譽地位以及學術體制這三條戰線展開。首先，早期成員背景相近，意識形態的分歧還不明顯，如今卻越來越嚴峻，還常跟激進主義或身份政治相互重疊。其次，基於名譽的競爭則反映出伊朗學術界的普遍現象：追求領導職位往往是為了獲取更多象徵資本，而不是為了承擔學術責任。最後，學術體制的發展極為不足：儘管研討會與會議頻繁，但學會內鮮少能看到真正的科學競爭的跡象——亦即缺乏針對理論、方法論或研究議程的辯論，而這類競爭本來應該能夠推動形成一個真正強大的學術社群。

這些模式並不僅限於內部動態，而是受到伊朗大學體系自身結構性缺陷的強化：包括學會成立前不均等的學術素養、大學內部有限的導師制度，以及食利邏輯與寡頭學術派系的支配。綜合來看，這些因素呈現出一個學會的悖論：它在形式上存在、具備公眾能見度且在規模不斷擴大，但它始終難以鞏固持久的學術與制度基礎。這讓它未來的發展軌跡依舊是個未知數。

> 未來前景

在伊朗社會學學會的種種體制模糊之中，轉型的契機正逐漸浮現出來。有一群數量雖小但去不斷在增加的批判性學者，他們往往沒有前輩所享有的特權，卻深耕於全球批判性思想，抵制以身份為導向的名譽追求，並力求在主流霸權之外建構獨立的學術主體。他們的承諾植根於民主實踐、知識多元主義與對體制的反思之中，雖然在學會的主流文化中仍處於邊緣，但這些努力無疑標誌著體制改革的可能性。

若要使這些思潮得以穩固發展，還需要幾個相互支撐的重要元素：首先是民主制度，用於將異質性轉化為討論而非派系鬥爭；其次是多元主義，以確保各工作小組能夠反映多樣的觀點；再者是運作自主，使這些小組能夠自主制定實質性的研究議程；最後是定期會議的連續性，且這些會議應轉向以問題為中心的研究，而非受基於身份認同或名譽導向的議程所主導。現在，研討會論文逐漸轉向以問題導向，這顯示改革與超越會議本身的長期合作的機會正逐漸到來。

> 前方的挑戰

今日的伊朗社會學學會所映照出的、重重堆疊的歷史遺產，包括革命前帶有精英色彩，且受外國影響的社會學；1980年代的意識形態斷裂與清洗；戰後數十年的食利官僚體制的擴張；以及當前日益破碎的學術文化。這段歷史為學會留下了生命力與波動性並存的局面：其成員基礎廣泛，包含官僚主義的擁護者、獨立知識分子以及積極參與全球對話

的批判性學者；然而，學會至今仍缺乏一套成文的自我認知體系，亦未建立起持續進行民主辯論的文化傳統。

學會未來面臨的挑戰不在於數量上的增長或公眾能見度，而是在於培養出一套習慣與規範，讓學會不再只是各個派系的總和。換句話說，我們的任務在於跨越「有形無質」的悖論：將展演轉化為實踐，將表象轉化為真正的學術成果。倘若伊朗社會學學會能紮根於多元主義、民主審議與學術自主，其異質性或可轉化為集體力量的泉源。若無此種轉型，它可能會只停留於形式，而無任何實質：外表看來團結，內裡卻支離破碎。它所選擇的發展路徑，將決定伊朗社會學集體未來的新篇章。■

來信寄至：

Esmail Khalili <esmaeil.khalili@gmail.com>

> 在政治與營利之間： 伊朗的私人社會學課程

Reyhaneh Javadi 和 Zohreh Bayatrizi，亞伯達大學，加拿大。



招牌上寫著「德黑蘭大學社會科學學院」。
在這張2009年的影像中，舊有的招牌靜靜地放在教職員庭院的一角，靠在一扇受損的大門上。
圖片來源：Reyhaneh Javadi。

長久以來，來自國內外的政經力量形塑了大學的教學與研究方向，往往帶來利弊參半的影響。近幾十年來，資金短缺、新自由主義的經費補助模式，加上教學與研究日益政治化，迫使各國大學必須優先發展職業導向的訓練，並配合國家或私部門的目標發展研究方向。在教育層面上，微型證書（micro-credentialism）、大型開放線上課程（MOOCs）以及證照導向等教育模式的出現，某種程度上正是為了回應這些更廣泛的政經壓力；這也加劇了高等教育的商品化、削弱了正規的課堂教育，並導致許多教育與學術探究領域面臨貶值危機。

這些更宏觀的趨勢，有時會顛覆、有時則會鞏固在地脈絡中既有的動態關係。以本文關注的伊朗而

>>

言，政治審查、經費短缺，加上將意識形態置於學術專業之上的聘用制度，長久以來限制著社會學的教學。另一方面，自二十一世紀初以來，學生發起的倡議行動便不斷爭取更高品質的教育與思想交流的自由。學生們自發地組織讀書會，討論熱門或被禁止談論的議題，並與遭到政治邊緣化的學者共同開設私人課程。隨著時間推移，民間也逐漸出現了私人的付費課程，以彌補大學體制內的教學品質落差，並提供替代的教育平台。

本文將探討伊朗的私人社會學課程，分析其起源、結構、參與者、教學品質的評價，以及更廣泛的政治與學術意涵。我們主張，這些課程體現了學術界中商品化與抵抗的雙重動態。本研究結合了多種研究方法，包含檔案研究、網路資料搜集，以及半結構式訪談。我們一共訪問了來自8間開設社會學課程的私人機構中的28位學生與講師。我們的研究顯示，儘管其中某些現象是伊朗所特有的，但在某些方面，它們與全球高等教育更廣泛的轉變趨勢相符，特別是知識的商品化。然而，在伊朗的脈絡下，私人社會學課程同時也作為一種潛在的抵抗空間，以對抗國家所施加的種種限制。

> 私人課程：從讀書會到牟取暴利

在伊朗，讀書會與系列講座長久以來便已存在；然而，付費的社會學課程要到了 2010 年代，才開始在私部門的教育機構中出現，例如 [Porsesh](#) 和 [Rokhdad-i Tazeh](#)（德黑蘭兩間知名的機構）。包含 [伊朗社會學會](#) 在內的學術協會也開始提供付費課程。這些平台提供的課程涵蓋了廣泛的領域，從熱門到小眾的理論主題（如《精神現象學》、德希達的《柏拉圖的藥局》），到應用方法論（如論述分析、NVivo 質性編碼）。這些機構體現了一種「影子教育」的形式，它們與正規機構並行運作，但被截然不同的誘因與邏輯所形塑。

許多私人課程以單向講授為主，學生的參與度有限，且缺乏課程大綱、評量機制或作業。少數私人機構會頒發證書，主要供博士班申請者用來強化個人履歷。落差極大的課程收費，以及販售課程錄影所帶來的微薄收入，構成了這些機構的利潤來源。儘管存在經濟誘因，私人社會學機構的獲利普遍不高，在本研究訪問的八所機構中，已有兩間宣告破產。

毫不意外地，這些機構會優先開設低成本、單向講授式的熱門主題課程。起初，這些多半是流行的理論主題，吸引了德黑蘭等主要都會區的知識階層，創造穩定的客源；這些城市不僅設有多所主要大學，其學術圈長久以來也發展得相當蓬勃。然而，這些課程也面臨了批評的聲音。其中一名受訪者便指出，私人機構的營利動機如何使他們更加側

重於小眾的西方理論：「這些機構主導了議題設定，他們是勢力龐大的企業，運作起來宛如商人。而商品是什麼呢？（社會）思想就是商品；而這種思想與我們實際的社經處境根本嚴重脫節。」（受訪者5）。

> 私人的底層反公共領域

這些空間發揮了 Fraser 所謂的底層反公共領域（subaltern counterpublics）的作用：一種半自主的論壇，讓邊緣化的聲音能夠在國家控制之外，參與批判性論述。參與者來自多元的學術背景，其動機包括學術探索、政治挫折感、建立人脈，以及逃離大學體制的壓力。許多人將這裡視為知識上的避難所，尤其在 2010 年代，也就是 2009 年「綠色革命」（Green Movement）遭到鎮壓之後，該事件對大學校園造成了嚴重的衝擊。對於遭到政治邊緣化的社會學家而言，私人課程既提供了學術參與的管道，也是維持生計的來源；同時，擁有穩定收入的大學教授也會來此授課，因為他們將這些課程視為能夠更自由表達批判觀點的空間。

儘管需要取得政府許可，但私人機構仍能提供比大學更為開放的討論空間。相比於大學中僵化的層級體制，學生更享受私人課程裡輕鬆的權力關係。有些人將這些機構視為知識聲望的來源，特別是現已歇業的 Porsesh，該機構在全盛時期握有相當可觀的象徵資本與菁英社會資本。私人課程也吸引了那些渴望跨出校園、向其他大學教授求教的學生。

參與私人課程的學生經常批評大學的社會學課程缺乏成效，進而促使他們尋求替代方案。雖然私人課程提供了更高的參與度，但各界對其教學品質的評價卻褒貶不一。有些人看重其提供的專業知識，但也有人認為這些課程只是將知識商品化，授課內容幾乎都是大眾本就可輕易取得的公開資訊。他們認為思想商品化的風險在於，將複雜的理論工作，轉化為供個人消費的市場行銷內容。

許多私人課程為那些不滿足於大學有限課程、渴望尋求深層理論探討的學生提供了知識空間。然而，批評者認為，這些課程往往過度推崇西方思想，卻未能探討其與伊朗在地脈絡的關聯性。其中一名受訪者將這種體驗比喻為一種精神上的宣洩，參與者以為充實了知識，但實際上卻缺乏實質的學習。該名受訪者也為官方的大學教育辯護，表示大學教育能讓學生接觸到伊朗本土的社會研究，而不像許多私人課程那樣，僅將焦點放在脫離現實的理論探討上。

> 影響

在伊朗處處受限的學術環境下，私人課程提供了一個備受爭議卻至關重要的替代方案。有些人認為，這些課程藉由提供高品質的替代方案，削弱了大學的根基，進而使學生不再參與學術體制內的倡議行動。另一些人則認為，在國家嚴密控制的學術環境中，私人課程對於保護獨立的社會學論述是至關重要的。他們主張，大學體制已過度僵化而難以改變，這使得體制外的知識生產空間成為必要。還有些人將私人課程視為一個嶄新、但存在缺陷的批判性參與平台：「如果這些機構關閉了，我們還有什麼替代方案？國家將會掌控一切。」（受訪者 23）。

私人課程也揭露了伊朗高等教育系統內部更深層的結構張力，尤其是在改革與體制正當性的問題上。雖然有些人相信來自私部門的競爭壓力能迫使大學做出改善，但也有人擔心這些機構會成為轉移焦點的工具，讓國家得以規避改革的責任。對許多人而言，在伊朗處處受限的學術環境下，私人的社會學課程確實提供了一個備受爭議卻關鍵的替代方案。

私人課程的社經影響同樣值得關注。數十年來市場導向的改革，重塑了伊朗高等教育的樣貌，使入學管道變得日益階層化。主要公立大學的入學競爭變得異常激烈，且申請機制極易遭到高收入家庭的操弄。此外，這些大學理應免收學費，卻不斷利用各種漏洞來向學生收取費用。公立大學教學品質的下滑與私人付費課程的興起，強化了既有的不平等，並進一步限縮了取得高品質教育的管道。

在許多國家，微型證書的出現源於企業對大學端所施加的壓力。而在伊朗，付費課程則起因於政治局勢的動盪，以及由國家控制的學術體制本身的弱點。起初，這些課程的目的是提供人們進行思想辯論的知識空間，但如今它們也納入了技術導向的訓練與認證制度，以提升學員的升學與就業前景。

> 結論

伊朗的私人社會學課程不僅體現了一種市場適應，它們更盤據在一個商品化與抵抗相互交鋒的位置。作為一種影子教育，它們反映了新自由主義下的文憑主義邏輯，但同時也創造了挑戰國家控制與思想趨同的反公共領域。這種針對系統性政治限制的私有化解方，反映了伊朗高等教育更廣泛的變遷，亦即在經費短缺、意識形態干預以及不平等加劇的背景下，公立教育機構正不斷遭到削弱。

未來的研究應該探討社群媒體作為一種知識參與場域的興起，將如何影響公共知識的動態關係，並重塑正式與非正式教育之間的邊界。社群媒體平台固然可能拓展公共社會學的版圖，將批判論述延伸至課堂之外，但同時也可能透過品牌經營與內容變現，使知識進一步被商品化。這種轉變究竟是讓社會學知識的觸及管道變得更加民主化，還是僅僅以數位形式複製了市場邏輯？這仍是一個有待探究的開放性問題。■

來信寄至：

Reyhaneh Javadi <javadil@ualberta.ca>

Zohreh Bayatrizi <bayatriz@ualberta.ca>

> 伊朗的族群性：

當地社會學所迴避的問題

Aghil Daghagheleh，北科羅拉多大學，美國。



伊朗族群多樣性地圖，顯示主要族群。
圖片來源：伊朗的族群，作者 Mapper 01
維基百科，CC BY-SA 4.0。

伊朗的族群議題就像是「房間裡的大象」——至少對主流社會學界而言是如此。伊朗境內擁有多個族群，包含波斯人、庫德人、突厥人、阿拉伯人以及俾路支人。波斯人在中部高原佔絕大多數，而其他族群則多集中於邊陲地區。這種族群分界又正與宗教差異相互交織，什葉派在中心地區佔多數，而遜尼派人口則多集中於邊陲地區。即使只是如此簡短的描述，也足以引發諸多社會學提問，例如：這些族群與宗教的差異及交織，是如何形塑人們的社會經驗？然而，令人訝異的是，在關於伊朗的學術研究中，這些分歧現象卻遭到了忽視。

這並不是要否定日益增加的族群相關文獻，這也是我稍後會談到的部分。但在一般的社會學研究中，「族群」作為一個劃分伊朗社會經驗的分析範疇，在很大程度上是遭到否定的。探討各種主題的研究不斷出現，從伊朗革命、女性抗爭、社會運動、底層政治，到該國所面臨的其他社會政治挑戰。然而，多數研究的主體始終停留在單一的「伊朗人民」，忽略了背後的族群差異。

這種否定，一方面源自於國族主義的視角，將伊朗描繪成一個自古以來便統一且同質的國家。因此，族群被視為僅是文化上的差異，而非構成社會經驗的結構性面向。這種觀點經常透過頌揚古伊朗文明和雅利安血統的神話，來合理化國家的統一性，並否認國族內部存在差異。在這樣的框架下，將族群納入理解該國日常現實的分析主軸，被認為是無關緊要、甚至危險的；因為人們擔憂，承認族群的存在將會鞏固這些差異，進而撕裂這個被想像出來的統一整體。

批判學者更傾向承認國族是一種現代建構產物。他們多數都認知到，在全球民族國家形成的歷史中，伊朗並非特例。然而，在這種學術傳統中，「族群」作為形塑伊朗社會政治生活的一個結構性面向，卻鮮少受到關注，儘管近期有些研究已開始試圖填補這塊缺口。例如Kadivar等人（2025）近期的一篇論文，便在分析伊朗近期抗爭浪潮時，納入族群的分析視角。然而，這種研究取徑依然處於邊緣位置。

這種分析上的失聲絕非偶然，而是根植於伊朗社會學本身的位置性。在歷史上，學術領域一直是由波斯人、什葉派以及中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傳統所形塑。這種傳統傾向於將國族與伊朗中部高原的文化、語言及歷史經驗畫上等號，從而忽略了其他社會實在存在的可能性。當我們考量族群與宗教的交織性時，這一點就變得尤為關鍵，因為龐大的邊陲人口既是遜尼派，又非波斯人。另外必須注意的是，不同的邊陲社群，在與中央政府的互動關係上，各自經歷了不同的歷史軌跡。舉例來說，現代伊朗國家的建立，在中心地區被廣泛頌揚為現代伊朗國族的誕生與領土完整的象徵；[但在邊陲地區的記憶中，卻代表了自治權的喪失](#)。1979年的伊斯蘭革命亦是如此，當時以什葉派為主的取向，在邊陲地區引發了抵抗與隨之而來的暴力鎮壓。當然，這類例子不勝枚舉。但重點在於，[借用伊朗歷史學家 Arash Khazeni 的話來說，這些來自邊陲的觀點](#)在相關的學術研究中，依然處於嚴重缺席的狀態。現下的問題不在於這些觀點難以調和，也不僅僅是研究者缺乏透過邊陲人群視角看待社會世界的個人意願。真正的問題在於，對一個深植於中心的學術立場而言，邊陲觀點在很大程度上是根本無法想像的。當然，潛藏在這一切問題底下的，是更深層的權力關係，不過在此我先不做討論。

> 族群在伊朗通常都被形塑成病理學問題，而非不平等的一個分析面向

儘管族群議題大程度上存在這種分析上的失聲，伊朗的族群研究仍發展成一個狹隘、孤立卻日益成長的領域，國內許多關於族群的研究都採取了[政策導向的病理學視角](#)。族群被定調為一種「問題」，一個影響國家完整性，並且必須被加以監控、遏制或消除的對象。研究者們彷彿在評估風險般，穿梭於各個族群之間。他們不斷評估各個社群的國族認同程度，衡量人們的族群歸屬與國族歸屬究竟是一致還是分歧，以及這在當下是否構成了威脅。

諸如分離主義、國家團結以及族群中心主義等主題主導了整個研究領域，有些研究甚至否認伊朗境內存在著「族群」，並將其描繪成是菁英或境外勢力意圖分裂國家所捏造的迷思。其他研究則將其視為一場正在發酵的危機，認為它是影響國家主權的潛在威脅或是未來衝突的引爆點，更是一個需要被診斷、治療與管控的國安弱點及挑戰。借用 James Scott 的話來說，這確實是一種「[以國家的視角來觀看](#)」(see like a state)的社會學。它試圖讓族群人口變得清晰可辨且易於管理，以達到控制的目的，而非以族群自身的主體性去理解他們。

同時，一批更具批判性與詮釋性的研究在此浮現，分析族群政策是如何被更宏觀的國家建構計畫所形塑。這類研究並未以病理學的框

架將族群視為待為管理的問題，而是將族群認同置於國族建構、強制融合與不均衡發展的歷史過程中。這類研究傳統探討了國家論述與體制如何透過語言同質化、壓制少數族群歷史，以及將非波斯社群安全化 (securitization) 等機制，來製造邊緣化。部分學者也點出了日常抵抗的形式：少數族群如何協商、顛覆或挑戰關於國族認同的主流論述。此外，探討教育、醫療與經濟機會中[族群落差的實證研究](#)也正日益增加，儘管綜觀來說數量仍屬有限。這引發了一個深具挑戰且至今多半懸而未決的問題：在當代伊朗，族群是否應該作為一個檢視不平等的面向。

> 族群與長期抗爭的緊密糾葛

然而，重要的研究缺口依然存在。首先是概念層面的缺口：在伊朗的脈絡下，族群的概念依然是模糊的，這使得部分學者選擇以「少數群體」等詞彙來替代，以迴避政治與理論上的張力。「少數群體」多指涉數量上的稀缺或結構上的從屬位置，但較少觸及那些具爭議性的問題，例如：如何定義一個族群、如何劃定其界線，或是如何避免本質主義式的認同論述。這種詞彙的置換，讓學者們得以追求 Rogers Brubaker 所謂的「沒有群體主義的族群性」，如同 [Elling 的著作](#)所示。這使得學者在分析邊緣化現象時，得以避免訴諸集體認同的主張，或對國家主權提出挑戰。

然而，有個問題依然存在：在伊朗的脈絡下，族群，又或是以「少數群體」這個更謹慎的框架來說，究竟意味著什麼？當我們未經充分批判便直接套用西方理論框架時，這個問題就顯得尤為重要。這些西方理論往往強調認同、文化差異或象徵界線，卻鮮少關注主權的歷史問題。在伊朗，族群不僅僅關乎文化的獨特性，它與長期以來針對國家主權、領土控制，以及對邊陲地區的強制兼併等抗爭緊緊交織在一起。伊朗的主要族群，包含突厥裔、庫德人、俾路支人、阿拉伯人與土庫曼人，大多集中在被稱為邊陲的地區，並在地理上遠離德黑蘭與中部高原。這些地區及其社群往往擁有半自治的歷史，並與中央政府長期存在著緊張的關係：將這些地區納入伊朗國家政治實體的過程，伴隨著軍事行動、強制同化以及人口控制。然而，在當代關於族群的分析中，這些歷史卻經常被排除在外，導致我們難以全面掌握今日族群動態的複雜性。

> 將部落歷史納入族群社會學，揭示歷史遺緒如何形塑當代現實

誠然，國家力量向邊陲地帶擴張的過程已有[文獻](#)記載，尤其是在受底層研究影響的文獻中。這些著作梳理了國家暴力與地方的抵抗行動，並多將其框架為「部落政治」。然而，關於部落政治與族群的研究卻始終各自孤立：前者被歸入歷史範疇，後者則被視為當代議題；這種割裂將掩蓋我們去理解歷史遺緒是如

何形塑當代現實的。若能填補這道鴻溝，將能為伊朗的族群研究開創全新的理論視野。

目前已有少數且日益增長的研究，正開始著手進行這項工作。這些研究借鑑了邊陲地區在國家建構過程中的歷史，進而對伊朗國家機器的本質提出質疑。他們檢視了迫遷、文化抹除與國家暴力的種種歷史事件，主張國家的形成不僅僅關乎現代化，更包含了殖民宰制的邏輯。從這個視角來看，伊朗向其具備獨特族群色彩的邊陲地區進行擴張，宛如一場殖民計畫，而對此的抵抗便構了解殖的實踐。這種重新框架的視角動搖了主流典範，並要求將部落歷史納入族群社會學的探討之中。

> 遭到噤聲的實證研究需求： 正視生命經驗的多重性

儘管如此，無論採用何種理論框架，理解族群都需要具備實證基礎。我們必須將其視為一種活生生的、不斷協商且具備情境性的現象來研究，而這種現象正是由日常實作與充滿角力的意義所形塑。這就要求研究者必須投入長期的民族誌參與。然而，在伊朗，這類研究卻受到政治與結構性障礙的嚴重打壓。族群的安全化措施形塑了一種恐懼與自我審查的氛圍。研究者與報導人同樣都面臨著被指控為宣揚分離主義或危害國家安全的風險，這使得田野工作變得如履薄冰，學術機構也不太可能去支持那些挑戰主流論述的研究。

將族群置於伊朗社會學的核心關懷可以迫使學界必須直面自身的排他性、挑戰主流的國族想像，並承認生命經驗的多重性。這同時也促使我們對伊朗國家機器產生更貼近現實的理解——這個國家不僅是由革命與意識形態所形塑，更是由充滿角力的地理空間、邊陲歷史，以及對主權的抗爭所共同建立的。■

來信寄至：

Aghil Daghagheleh <aghil.daghagheleh@unco.edu>

> 處境中的生命與知識之爭： 重奪伊朗性別研究

Shiva Alinaqian，獨立研究者，伊朗。



插畫來自：Yonesu

在 我於德黑蘭（Tehran）的大學教授性別、民族誌與敘事課程的八年裡，我的個人經驗一直被制度方面的限制與日常政治所糾纏。我的教學職位在2022年——即「女性、生命、自由」起義（吉納起義¹）展開的時刻——被免職，不僅標誌著個人的斷裂，更暴露了伊朗關於性別的批判性知識的生產如何與權力關係還有日常抵抗形式密不可分。在這些條件下，即使是很小的教學決定——邀請學生撰寫迷你民族誌、強調生活體驗、或將全球女性主義理論與在地敘事並置討論——也會變得非常政治化：它們破壞了制度的預期，即性別仍然僅限於法律—行政（legal-administrative）或「安全的」家庭政策框架。

因此，課堂不再是受保護的學術空間；它是一個處所，在其中，國家的規訓邏輯與學生理解自身生命的欲求發生衝突。對我的解聘，不過是更加顯明了許多教員早已知道的事情：在伊朗這個地方，性別知識是危脆的（precarious），因為它源於日常生活，而非不顧生活。

> 伊朗性別研究年表：一個由上而下建立的學科

為了理解在伊朗性別研究中運作的教學實踐的利害關係，必須將它們置於該領域的當地歷史脈絡中。伊朗的性別研究並非生長於一個開放而自主的學術環境，而是在一個社會科學已受到嚴重限制和政治監控的脈絡下發展開來的。文化革命（譯按：指的是伊朗的文化革命而非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在1980年至1983年間對各大學機構的重組行動——的陰影仍形塑著今日伊朗的學術生活：各個人文學科相關的部門都受到審查、課程被重寫，而被認為具有潛在破壞性的學科則受到嚴格監管。性別研究即是在這樣的懷疑氣氛中誕生的。

二十一世紀初，性別研究的領域作為國家項目正式啟動。女性研究的計畫被引入到各個主要的大學之中。但其目的從一開始就不在於培養女性主義批評，而是要對一個在社會上越來越顯眼的知識領域進行管控（regulate）。隨著女性行動主義的擴大以及性別辯論進入公共生活，國家透過界定研究「女性問題」的術語來遏制這些能量。該學科成為了將社會關注轉化為法律—行政以及家庭中心之類的框架的機制，而不是允許它們發展為批判性的調查。

伊斯蘭教神學院使得這種緊張關係更加明顯。女性主義理論進入這些神學空間，但僅限於伊斯蘭法學（Islamic jurisprudence）的範圍內。它們被調動來重申「自然角色」、捍衛教義邊界或提出宗教異議，而不是為了重新思考性別等級制度。在各大學和神學院中都流傳著女性主義的各種概念，但只有在其變革潛力受到有效中和的條件下。

這些制度性選擇被管理社會科學的更廣闊的認識秩序給加強了。實證主義和古典的量化方法主導著制度上的等級制度（institutional hierarchy），形塑了被視為合法知識的東西，並將基於生活體驗或體現（embodiment）的方法視為「不科學」。這種等級制度符合國家對去政治化（depoliticized）及有行政有利（administratively useful）的學科的慾望。

>>

> 草根知識和來自下層的抵抗 在致命缺陷中開闢了機會

一個根本性的缺失進一步形塑了該學科：近乎遭到完全排斥的酷兒理論，在法律和學術上都深受邊緣化。這一缺漏禁止了性別研究進一步發展出可能將性別與性傾向、慾望、親屬關係及非規範體現聯繫起來的交叉分析。相應地，英語自由女性主義（Anglophone liberal feminism）的主導地位——在沒有產生它的社會基礎的情況下引進——將該領域縮小到個體化的和中產階級式的關懷。雖然不足以提出影響少數族裔和屬下階層（subaltern）女性生活的結構性條件，這一框架在中產階級背景下帶出了尚未解決的挑戰：生殖和護理工作的持續貶值、法律上的可受傷性，以及貧窮的女性化。這些力量共同造成了一種名義上存在但實質上受限的學科：它如今必須同時面對其長期忽視的受眾群體，以及其所自以為核心之內部仍然持續存在的不平等。

即使學術領域仍然狹窄，它卻在社會上引起了共鳴。雖然女性研究從未完全在大學內鞏固，但始自二十一世紀初，它與女性行動主義深深地交織在一起。透過非政府組織、慈善協會、文學界、運動和日常實踐的無聲抵抗，女性產生了自己的分析和批判的形式。這些草根的知識形式在與自上而下建構的學術結構的張力中存在著。

這段歷史過程產生了一種由兩種相互對立的力量所形塑的學科：自上而下的管控與自下而上的抵抗。這二元動態——國家控制與女性主義創新——界定了伊朗性別研究的軌跡，並繼續為重新思考社會知識的界線開闢了機會。

> 從管控到奪回：伊朗性別研究的改造

在長久以來構建了伊朗性別研究的各種制度性限制下，女性主義學者、學生以及運動人士穩固地——經常是默默並冒著個人風險地——付出努力，以便重奪他們被從中排擠在外的智識空間。在我的課堂內，這樣的抵抗可見於學生們選擇撰寫的報告：關於照護勞動、親密關係、流動性，以及那些形塑性別化生活的細節規範之敘述。這些可不僅僅是習作，而是一種叛逆（insurgent）的知識型態，反向抵抗著該領域被馴化的趨勢。

在大學體制之外，女權運動人士、非政府組織的組織者、庫爾德（Kurdish）、阿拉伯及卑路支（Baluchi）的女性主義者、女性移民，以及許許多多的人，建立起以活生生的掙扎經驗而非國家認可之課綱為基礎的分析框架。這項長期累積的工作，為其後的吉納起義所引發的深刻轉向奠定了基礎。

吉納時刻源自伊朗庫爾德斯坦（Kurdistan），使一種新的女性主義意識可被辨識：其取向乃交叉性的、去殖民的及跨國性的。它汲取自庫爾德、卑路支、阿拉伯與移民女性數十年的組織經驗。這些女性長期面對父權、軍國主義、種族邊緣化和經濟剝奪等相互交纏的統治機制。她們的鬥爭使以德黑蘭為中心的女性主義被地方化（provincialized），揭示出性別與族群、階級、暴力以及殖民性是如何不可分離的。

這一新近出現的女性主義意識乃根植於在地，卻同時關注暴力與團結在全球脈絡中的流通。它承認羅傑拉特（Rojhelat）及希斯坦—卑路支斯坦（Sistan-Baluchestan）的抗爭，與巴勒斯坦及阿富汗的抗爭彼此共鳴，而其對生命和尊嚴的要求始終是跨國的。它挑戰性別研究脫離其由國家形塑的起源並以自下而上的團結為軸心，並圍繞著從身體、社群與日常生活之生存之中浮現的知識來重建自身。

> 落實一種基於生活體驗的 社會學以及委身於集體轉化之需要

從這個角度來看，我的解聘並非孤立事件，而是更廣大鬥爭——關於誰有資格生產知識，以及哪些知識形式被允許存在——的一個徵候。它提醒我們，要重奪性別研究，就要把那些長期被視為邊緣的敘事、照護以及紮根式探究推到舞台的中央。

由此出發，女性主義實踐（feminist praxis）所呈現出的並非性別研究的替代方案，而是其重新導向。它推進一種區域性的團結倫理，將少數族群、阿富汗及巴勒斯坦人的鬥爭並置，卻不致製造苦難的階序（hierarchies of suffering）。在這景觀中，性別研究作為一種連結性的實踐而浮現，傾聽、翻譯並使邊緣化的生活世界變得可見：一種既處境化又具橫跨性（transversal）的認識論；既紮根於脈絡，又能跨越學科、國族與身分的疆界。其未來不取決於制度性的承認，而是取決於能否生產並落實一種以人民為本、基於生活體驗並委身於集體轉化的社會學。■

來信寄至：

Shiva Alinaqian <sh_alinaghian@yahoo.com>

1譯註：吉納起義（Jina uprising），指的是2022年伊朗庫爾德族女子Masha Amini或稱Jina在道德警察拘留期間死亡後，引爆並迅速擴散至全國的抗議浪潮。

> 重重限制下的伊朗社會學研究： 圓桌論壇



圖片來源：Hans-Peter Gauster，經Unsplash報導。

本次的圓桌論壇匯聚了六位致力於伊朗研究的社會學家，他們分別立足於不同的學術領域與制度環境，並橫跨多個地緣政治區域。儘管他們在社會學學科訓練上志同道合，但他們各自在伊朗境內與境外所處的位置，塑造出迥異的立場，從而跨越國界、語言與制度藩籬，共同建構知識體系。本圓桌會議圍繞三個核心方法論問題，探討伊朗社會學研究面臨的挑戰、創新與倫理困境。儘管研究主題涵蓋都市生活、教育政策、數位行動主義及環境正義等多元領域，所有參與者皆秉持紮根實證、批判與反思性參與的學術態度。每位學者皆在政治限制、知識消弭、制度束縛及全球知識生產階層結構的複雜環境中，探索伊朗社會研究的疆域。參與者簡述如下：

>>

Nafiseh Azad 是駐伊朗的社會研究者，其研究聚焦於運用質性方法探討性別與都市生活。Maral Latifi 作為研究都市邊緣性與社會受苦的伊朗學者，深入剖析德黑蘭社會階層向下流動的現象。Mahbubeh Moqadam 現為美國伊利諾大學博士候選人，運用跨國女性主義理論研究青年行動主義、美學與政治主體性。Fateme Moghadas 是伊朗教育與社會政策學者，研究教育私有化、童工現象及反貧窮策略。Ladan Rahbari，荷蘭阿姆斯特丹大學社會學副教授，探究（數位）論述與性別及抵抗的政治。Reza Sohrabi，渥太華卡爾頓大學博士候選人，研究環境政治與水資源短缺問題。

這些學者共同探討三大核心議題：如何在監控與受限的環境下突破研究伊朗的方法論限制；在政治敏感性與風險並存的背景下，哪些倫理框架能引導其研究方向；以及全球權力動力如何塑造知識生產的條件與層級結構。這些問題由 Reyhaneh Javadi 與 Nazanin Shahrokni 提出，她們不僅為對話設定框架，更引領了整個討論進程。

Reyhaneh Javadi (RJ) 與 Nazanin Shahrokni (NS)：讓我們從那些形塑了「研究之可能性」本身的各項挑戰開始談起。在進行關於伊朗的研究時，您曾遭遇過哪一項具體的方法論障礙？您又是如何應對或調整研究策略？這段經驗對於在政治限縮或資訊不透明的語境下從事社會學實踐，提供了什麼樣的更廣泛的啟示？」

Nafiseh Azad：我近期的研究聚焦於女性與都市生活的交織，並透過質性研究方法探索女性的生活經驗。在研究過程中，有兩大阻礙持續貫穿著這項研究，並決定了這項工作開展的路徑，包含數據獲取受限，與圍繞著伊朗女性議題的高度政治敏感性。

獲取可靠數據仍是社會研究的重大挑戰，尤其在性別相關領域。關鍵統計數據——如自焚或榮譽謀殺案件——往往被列為機密或無法取得。透過交叉比對伊朗統計中心數據與半官方機構及民間組織發布的數字，我得以在重重限制下，萃取出部分洞見。

第二道障礙源於伊朗官方文化與民間文化間日益擴大的鴻溝，這不僅侵蝕了獨立國家級研究的可能性，更摧毀了相關研究基礎設施。願意觸及敏感議題的獨立研究機構寥寥可數，但它們在大學體系之外提供了關鍵契機。我近期關

於女性經濟能動性的研究，便是透過此類機構完成。

政治敏感性依然位研究課題設下諸多限制：某些議題仍屬禁區。儘管如此，透過聚焦於可接觸的群體與領域，並在方法論上尋求創新，我得以產出具廣泛社會學意義的深度質性數據。雖然研究成果的公開傳播仍受限制——尤其在學術期刊以外的平台——但著肘策略讓我得以持續維持批判性的研究動能。

Nafiseh 對於獲取女性議題可靠數據之難處的反思，與我研究社會政策制定時的親身經歷不謀而合。在我的工作中，所遇到的障礙並非源於文化禁忌，而是源於深植於該領域本身的制度性限制。

社會政策制定需仰賴研究者與決策者間的持續互動，但在伊朗，這種關係顯然是很薄弱的。學界由抽象且偏重哲學的研究路徑主導，加上政策制定者對實證研究的需求微乎其微，這不僅孤立了研究者，更切斷了知識生產與政策行動之間的聯繫。這種斷裂深刻地影響了我對教育不平等及公立教育私有化的研究，使我在過程中反覆遭遇方法論的障礙。

首先是微觀層面的數據搜集的問題。要有效分析教育不平等現象，必須取得能反映學生個人背景、家庭狀況與環境脈絡的數據。在伊朗，此類數據不僅稀缺、報告不一致，且通常僅能取得國家或地方層面的資料。透過教育部等機構取得詳細數據的正式管道，大多缺失或形同虛設。這迫使研究者仰賴非正式管道與個人網絡——此類方法不僅難以持續，更充滿倫理爭議。

其次，政府對調查數據的管控構成重大的阻礙。自1990年代以來，伊朗雖進行了大量由公共機構資助的全國性及地方性意向調查，但獨立研究者始終無法取得相關數據。這種對實地數據的壟斷，加劇了伊朗社會科學領域可靠資料來源的整體匱乏。

最後，研究場域的進入門檻日益嚴苛。即便持有部會核發的官方許可，進行校園觀察、訪談或其他形式的數據蒐集時，仍常遭遇官僚障礙或猜疑。教育環境被視為政治敏感空間，連基礎實證研究都難以開展。研究者往往被迫依賴文件或二次分析，導致質性研究的範圍與深度受限。



伊朗國家圖書館。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這些限制不僅形塑了可探討的議題範疇，更直接影響在伊朗進行具實證基礎之政策研究的可能性。

Ladan Rahbari：如同 Fatemeh 所說的，我也一直苦於數據獲取困難或資訊不全的問題，但她所提到的那種制度性隔閡，對於離鄉背井、且無法安全或輕易進入田野的研究者來說，呈現出了截然不同的樣貌。在伊朗境外進行研究，無疑增添了另一層複雜性。關於這點，我可以從我對於反抗與異議的數位論述的研究中舉例。

在我當前的研究項目中，我正分析 2022 年「女性、生命、自由」運動期間及之後流傳的波斯語推文。作為一名在專業與個人層面皆與主題密切相關、卻遠居事件中心地帶之外（荷蘭）的研究者，我耗費了相當時間才對這場運動建立社會學層面的理解，並準備好展開研究。

我的研究聚焦於波斯語使用者如何表達對宗教

的態度。我始終面臨著一項方法論的挑戰：如何將「作為宗教信仰的伊斯蘭」，與「作為政治體制的伊斯蘭共和國」兩者之間的批判，精準地釐清與區隔開來。這項分析難題對許多研究伊朗及宗教政治論述的學者而言並不陌生。我觀察到研究者往往傾向過度詮釋數據，使其偏向兩極立場之一。

若能直接進入田野，我將輔以大規模質性—量性調查來深化意圖與詮釋的釐清。我深知遠距調查在技術上可行，但透過他國線上工具實施將衍生諸多複雜性與偏誤。此外，正如伊朗研究學者所知，離散社群無法作為伊朗整體人口的可靠替代樣本。因此，我只能運用這些不完美的工具進行研究。

當然這些挑戰還是有能夠克服的方法。舉例來說，我必須採用替代方案，諸如邀請協同閱讀人、進行協作詮釋，以及實施成員查核（Member-checking）技術。即便如此，我仍然深信這些策略雖然具有價值，卻無法完全取代在伊朗境內進行嚴謹且具代表性調查所能達到的深

>>

度與廣度。針對特定對象的遠端成員查核法或許能稍解燃眉之急，卻無法徹底消除詮釋上的歧異。這僅是我近期研究中眾多方法論限制與挑戰中，必須正視並設法突破的一個近例。

Mahbubeh Moqadam：我深切認同 Ladan 對田野距離感與旅行限制的憂慮，這迫使我重新定義「身處田野」的意涵。在研究 Z 世代於「女性、生命、自由」運動中的角色時，我面臨最嚴峻的方法論挑戰，在於無法親赴伊朗進行實地田野調查。此限制阻斷了民族誌研究至關重要的日常互動與非正式對話管道。

該運動催化了伊朗各地青年主導的抗議行動，反對基於性別的暴力與威權統治。我並未放棄這個主題，而是轉向數位民族誌研究。我持續鑽研此方法，並開始系統性地從社群媒體、新聞報導及數位檔案庫收集資料。為深化此數位研究法，我透過滾雪球抽樣法建立信任網絡——不僅與現居伊朗者進行線上訪談與非正式對話，亦接觸近期離境人士。同時定期與往返伊朗與美國的旅人交流，針對性提問並彙整其觀察。伊朗友人則協助我取得最新研究文獻與學術論文。

儘管研究尚處於初期階段，此種適應性多源策略已使我得以洞察研究對象的日常生活與觀點，即便身處異地，仍能對該領域形成更扎實且細膩的理解。

Reza Sohrabi：Mahbubeh 轉向數位民族誌與軼事敘述的實踐，令我深刻體悟當今研究的可及性不僅取決於與參與者的關係，更繫於研究方法本身。就我而言，信任建立不僅是研究的先決條件，更成為一種獨立的研究方法。

我的博士研究聚焦伊朗水資源短缺與社會運動，透過伊斯法罕省與庫茲斯坦省的比較研究，訪談學者、運動人士及農民探討水資源政治。田野調查的限制尤為明顯，尤其在招募參與者方面。

與 Mahbubeh 相似，海外研究使建立信任成為取得訪談的關鍵。為此我大量採用滾雪球抽樣法：在不透露是否會追蹤的狀態下徵求推薦名單，以保障匿名性。我同時發現社區參與是極有效的策略——在訪談前與參與者建立開放溝通，有助傳達研究的學術性質與目的。當他們理解自身貢獻的意義後，許多人便積極參與其中。

在政治敏感的環境中，研究需要立足於在地化的方法：這些方法仰賴參與者對研究者的信任，以及他們對研究價值的認同。對我而言，溝通與社區參與不僅是取得研究管道的工具，更是受限條件下以符合倫理且有效方式進行研究的核心要素。

Maral Latifi：Reza 所強調的敏感研究環境中信任的脆弱性，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我的博士論文透過 Bourdieu 的理論框架，探討德黑蘭中產階級的社會地位下滑現象，聚焦於伊朗近期經濟危機下社會受苦與空間遷移的相互纏繞。實證研究採集了 32 位經歷此軌跡者的訪談資料，其中 25 份構成分析核心。兩項核心方法論挑戰促使我們採用反思性、關係性的 Bourdieu 理論取徑。首先，受訪者需闡述多年累積形成的慢性沉澱式社會受苦——即 Bourdieu 所稱的「世界的苦難」。其次，這些經歷與貧困化進程緊密相連，而對中產階級而言，貧困化過程伴隨著特殊污名。

這種雙重困境可能使訪談淪為公式化的對話，更關鍵的是，可能在研究互動本身中重現結構性暴力。要以符合倫理的方式處理這些關於喪失與流離失所的敘事，必須採用謹慎且建立在信任基礎上的方法論。

RJ 與 NS：從您的反思中可知，方法論絕非單純的技術問題，而是由研究展開的條件所形塑：當研究管道極其脆弱、資訊遭到隱匿、研究場域本身持續動盪時，您在進行關於伊朗的研究時，是如何處理與風險相關的倫理張力——無論是對您個人、您的對話者，或是數據本身的安全？有哪些倫理原則指導著您的決策？這些原則又在哪些方面複雜化、甚至挑戰了現有的主流研究倫理框架？

Ladan Rahbari：與許多研究伊朗的社會學家相同，我不斷面臨受訪者、自身及合作研究人員的安全與保密問題。然而，我近期面臨最嚴峻的挑戰之一，既非來自研究現場本身，也非源於伊朗政府，而是來自於我的大學的倫理審查程序。

在我為先前提到的計畫申請並取得經費後，本校倫理委員會卻將其標記為「高風險」計畫。他們的假設是：任何與伊朗民眾的接觸都可能觸發伊朗政府（遠距）監控機制，進而針對我本人、所屬機構，以及我所研究的社群媒體用戶進行干擾。我承認這些擔憂並非毫無根據，

>>

我也確實抱持著相同的顧慮；然而，校方為降低安全風險而提出的防護措施，卻顯得缺乏充分依據，更將使研究變得極其困難，甚至近乎不可能執行。

其中一項建議是要求我取得該大型數據集中所有社群媒體用戶的知情同意。此舉不僅難以實現，甚至可能適得其反——因為與我直接接觸反而可能讓這些用戶陷入更大的危險之中。另一項建議則是要求我在極度加密且封閉的數位環境中進行所有分析，並立即刪除數據；這將導致我無法重新檢視素材，也無法驗證我的研究發現。

歷經數月協商，我終於獲准得以推進計畫。這個漫長過程導致計畫延宕了數月才啟動。經歷這番折騰後，我深感沮喪而決定不再收集新數據，轉而採用荷蘭另一所大學同事編纂的現成資料集——該同事早已取得其校方倫理審查許可。如此現成資料集的存在實屬萬幸。

分享這段經歷，是為了揭示（西方）機構倫理框架本身如何淪為安全化的工具，尤其當研究聚焦於被視為「敏感」與「高風險」區域的所謂非西方語境時。這類程序縱使初衷良好，卻可能因此引發自我審查，或使學者們卻步，從而徹底改變研究主題或策略，進而限制學術自由——尤其對像我這樣的移民學者與離散學者而言。

Mahbubeh Moqadam：Ladan 所描述的那種體制性安全化的現象，也反映了我在研究工作中常面臨的倫理困境。在我針對伊朗 Z 世代數位行動主義的研究中，倫理張力往往圍繞著能見性與風險這兩者展開。

其中一個典型的案例涉及一名少女——她的 Instagram 公開內容在「女性、生命、自由」運動中，成為了具代表性的象徵。儘管她的貼文廣為流傳，我仍選擇不直接引用原文。取而代之的是，我將其內容進行匿名化與改寫，並融入複合敘事（composite narrative）之中，以避免其身份被重新識別。我始終將參與者安全與意願，置於數據的「完整性」之上。儘管某些倫理框架將公開數據視為中性素材，但在如此政治敏感的環境中，我絕不能忽視過度曝光所帶來的紀大風險。

在運動遭到鎮壓後，那個女孩刪除了大量貼文與限時動態。她的個人帳號的調性出現了明顯

轉變：Instagram 的精選動態與 Telegram 貼文從原本充斥著銳利的社會政治評論，如今轉向幽默趣聞與瑣碎日常。這種轉變深刻地體現了曝光後所面臨的真實風險。

在與伊朗境內受訪者進行線上訪談時，更多的倫理考量隨之浮現。我使用 Signal 等加密通訊平台，除非明確徵得對方同意，否則絕不錄音，並確保受訪者完全匿名。這些做法不僅是技術上的選擇，更是一種深層的倫理承諾；這樣的承諾源自於研究者與受訪者共同身處於危險與動盪的環境中所建立出來的。

Reza Sohrabi：Mahbubeh 對能見度的關注，正是我們許多人面臨的共同難題：如何在不讓參與者身陷危險的前提下，完整呈現他們的敘事？在我的研究中，我透過一套「以受訪者為中心」的研究方法來應對這項倫理挑戰，讓受訪者能隨訪談過程的推進，隨時評估並形塑訪談的進行方式。

事實證明，進行匿名訪談至關重要。這使得參與者能夠更自由地表達意見，而不必擔心遭遇後果。匿名性明顯地減輕了許多人在闡述觀點時感受到的焦慮。在一個案例中，有位運動人士詳細批評了政府的水資源管理政策，儘管對話過程氣氛開放，該參與者事後仍擔心其言論是否可能被追蹤。在深入討論相關風險後，對方確認其意見內容無法被識別，才同意將該內容納入研究中。

儘管如此，我仍採取了進一步措施來強化匿名性，包括刪除具體時間與地理位置的描述，以將曝光風險降到最低。此舉既保留其敘事的核心內容，也保障了受訪者的隱私安全。

這次經驗讓我深刻體悟到，進行倫理研究——尤其是在政治敏感的環境中——不僅需對能見度的倫理保持敏銳，更必須將保障參與者安全視為研究本身不可或缺的一環。對參與者的憂慮所保持的彈性與即時回應，是孕育信任空間的關鍵，而這最終也才使得這項研究成為可能。

Maral Latifi：如同 Reza，我逐漸體會到，倫理不該只是一份清單，而是一種持續性的互動關係。對我而言，這不僅需要重新思考匿名制，更需要重新審視與參與者互動的基礎邏輯。為了在倫理層面抵抗將參與者客體化的傾向，互動的視角必須從外在化的「你」轉向集體且具備共情能力的「我們」。

然而，正是這些促進信任與接觸的條件，也讓匿名化工作變得更加複雜，進而要求研究方法上的調適。例如，我選擇放棄描繪傳記式肖像——儘管它或許能更深刻地捕捉參與者受苦的關係深度——轉而採用主題分析法。雖然這犧牲了敘事的連貫性，卻能為受訪者的身份提供更周全的保護。

Fatemeh Moghadasi：Maral 提到的關於鄰近性與風險的觀點，點出了我經常面臨的一個兩難困境：支撐倫理研究的那些信任與親密感，往往會與國家機構產稱衝突，因為後者將任何批判性探究視為政治威脅。儘管學術界賦予研究者選擇研究主題與方法的自由，但只要研究跨越了學術邊界——無論是透過與國家機構合作，還是研究成果的公開傳播——這種自由便迅速萎縮。這些限制不僅是技術或官僚層面的問題；它們在本質上具有更深層的倫理與意識形態意涵。

在教育政策制定領域，當批判是針對管理效率低落或行政層面的缺實時，通常能獲得包容。然而，一旦批判轉向更深層的問題——例如教育體系的意識形態基礎、學校中植入的規範性價值，或是涉及語言、文化與政治正義的詰問——所引發的回應往往不再基於學術對話，而是源於意識形態的警覺或政治控制。

在這樣的環境中，結構性批判鮮少受到歡迎，反而經常被斥為「政治操弄」，或是被指控在「削弱國家體制」。這些條件使研究者陷入艱難的倫理處境，必須在科學誠實、田野准入，以及個人或專業安全之間不斷進行協商——特別是在以追求公平正義為目標的研究領域，更涉及其獨有的風險與複雜性。

Nafiseh Azad：Fatemeh 所提到的研究自由政治化的困境，正是女性研究的日常——在那裡，對安全與知情同意的考量形塑了研究的每一個階段。由於我採用的是民族誌方法與立意抽樣，匿名制變得至關重要，在針對女性的研究中更是如此。我採用多種技術來保障參與者的安全，包括匿名化數據儲存、刪除可識別細節，以及在研究結束後銷毀訪談紀錄。受訪者可以隨時撤回全部或部分的訪談內容，也可以隨時要求我停止錄音。我採取一切可行措施確保他們的安全，例如避免透過通訊軟體或電子郵件傳送訪談內容，且唯有在參與者明確同意的情况下，我才會將資料分享給研究團隊的其他成員。

在某些情況下，若受訪者不同意分享原始訪談內容，我會拒絕將研究提交給委託機構。在其他情況下，我則承擔起書面分析的全部責任，以避免洩漏參與女性的姓名或所在地。在缺乏制度保障與資源的非大學體系中，這些預防措施執行起來便更具挑戰性。

或許這份工作最痛苦且無可避免的一點在於，當我覺得無法保障數據、參與者或我自身在發佈成果時的安全時，我會預防性地放棄整個研究領域。

RJ & NS：這些倫理與方法論上的張力並非僅只是地方性的，它們更深植於全球權力結構之中，並受到知識政治的形塑。從「哪些問題可以被提出」到「誰的敘事被視為可信」，權力始終決定著什麼能夠稱作「研究」。全球動態——諸如國際制裁、離散者的位置性 (*di-aspóra positionality*)，或是西方學術界的期待——究竟如何形塑了伊朗社會學知識的生產、流通與接收？

Maral Latifi：另一種在伊朗較不顯見、卻阻礙著社會學知識產出的因素，是對於要求學術研究必須回應即時政治發展、或預測集體抗爭最終結果的普遍訴求。這種根植於「轉型中社會」話語的命令，微妙地抑制了對社會空間動態進行基礎研究的積極性。諷刺的是，正是這類壓力，限制了一套具備細膩闡釋當下的能力、並能想像未來社會可能性的伊朗社會學的誕生。

Fatemeh Moghadasi：延續 Maral 的觀點，我發現即便致力於推進長期或基礎研究，也往往會受阻於結構性的經費限制。伊朗社會學研究的一大障礙，是大學與研究中心過度依賴委託計劃案，而這些計劃經費通常來自於政府或半政府機構。此類計劃遵循「需求與回應」模式，幾乎沒有空間留給獨立或長期探究。

根據我的經驗，我曾針對迫切的社會議題草擬過研究計劃，卻因缺乏資金而最終未能實踐。這不僅浪費了研究潛能，也削弱了研究動力，更降低了知識產出的品質。

在國際層面，伊朗鮮少在社會政策制定領域被列為優先研究案例。聚焦中東與北非地區的機構，其研究議程往往傾向於符合國際組織的利益，或偏好選擇數據更易取得的案例。結果，伊朗議題經常被邊緣化，或被簡化為地緣政治與安全框架下的產物。

>>

此現象在教育私有化的文獻中尤為明顯。即便阿富汗與伊拉克處於危機之中，卻仍頻繁出現在分析中；反觀伊朗，儘管經歷重大的政策轉變，卻在學術討論中大程度地缺席。這部分原因於缺乏透明的數據系統，以及長期缺乏國際合作，使得伊朗難以在跨國研究框架中被定位為一個「可被分析的主體」。

Reza Sohrabi：延續 Fatemeh 關於結構性排斥的論點，我想進一步強調國際制裁如何重塑了學術研究最基礎的後勤運作，這對離散學者而言尤為顯著。美國對伊朗的經濟制裁從多方面衝擊了研究者。在田野調查期間，我無法為參與者提供經濟支援或致贈禮物，因為包括禮物卡在內的國際交易皆被封鎖。

我也曾申請過外部研究資助，但申請書根本未進入審核程序，僅因為五的田野地在伊朗。其理由是禁止在「戰區」進行研究——儘管近年來伊朗並無實質衝突，卻仍被歸入此類。這反映出西方對中東與全球南方地區的軍事化想像如何形塑其分類體系，誤導了當地現實，並將離散學者排除於核心資源之外。

這類經歷揭示了離散學者所面臨的獨特困境：行動受限、資金匱乏，以及在非政治化脈絡下工作的學者所不會遭遇到的結構性學術障礙。

Nafiseh Azad：Reza 所提到的孤立不僅是物質層面的，更是深層的智識隔絕。身處伊朗境內，我深切感受到由國際制裁與國內限制共同形塑的窒息式孤立。制裁限制了獲取學術資源、培訓計畫及關鍵研究工具的管道；參與國際會議常因簽證被拒而受阻，近年來更幾乎不可能實現。這些障礙誘因伊朗政府對參與國際活動的限制而進一步加劇，導致伊朗學者陷入全面性的孤立——這種孤立並非正在成形，而是早已根深蒂固。

然而，更令人不安的是西方學術機構的預設期待與偏見，它們往往遮蔽了伊朗社會——特別是關於女性——的複雜性與多元性。對於中東穆斯林女性的刻板印象持續左右著期刊審稿人與編輯的感知。我近期一篇論文被某知名性別研究期刊退稿，理由是研究發現被認為「難以理解或難以接受」。我發現這源於我的研究與西方關於穆斯林女性的主流敘事之間存在著「失調」。文中對於主體性、反抗，或是對家庭與母職的替代性詮釋，經常在根本層次上遭到質疑。

在整個審稿過程中，我愈發強烈地感覺到，自己並未被視為一名研究者，而緊緊被當作一名數據收集員。在另一篇歷經大幅修改才得以發表的文章中，我有一種鮮明的感受：那些從未踏足伊朗的審稿人，竟自認比我更了解伊朗女性。試圖呈現女性的多樣性與蛻變的努力，往往在全球學術場域中遭遇強大的阻力。這種動態在學術會議中更為顯著。遺憾的是，某些身處西方機構的伊朗學者甚至強化了這種風氣，以同樣「異域化」的視角來評斷同儕的研究。然而，透過深入田野所呈現出的女性，其生命軌跡與選擇，無不挑戰著這些片面而簡化的敘事。

Ladan Rahbari：我想將焦點轉移至離散空間——特別是西方學術界內部——關於發聲權與可信度的政治學。身為龐大伊朗離散社群中的一員，且在某種程度上受到體制資源賦權的學者，我一方面既能免於伊朗國家的直接壓迫，並享有並非人人皆能獲得的支援。儘管我仍面臨遠端監控與騷擾的威脅，卻同時遭遇其他形式的守門（gatekeeping），這不僅存在於學術機構內部，令人遺憾地，也存在於離散伊朗人的社群中。

我也觀察到，某些類型的聲音——尤其是那些被視為親西方的世俗派（有時是自封的）專家——更容易在西方語境中獲得青睞。這些人往往傾向複製關於西方救世主情結的殖民主義或東方主義敘事。在這樣的環境中，當某些（有時甚至是主導性的）離散敘事已然形塑了西方所接受或偏好的框架時，其他聲音變很難被聽見。

這使得產出紮根於實證的學術研究變得更加重要。然而，正如我先前所言，過度安全化的研究規範不僅對數據收集與處理造成了嚴重障礙，更阻礙了更廣泛的知識生產過程。我亦認同 Nafiseh 所說的：學術機構往往固守既定的認識論典範，在面對替代性的知識或知識生產形式時缺乏彈性。我認為我們需要摒棄將我們視為數據礦場、用以驗證既定西方理論的做法：伊朗的語境具有其獨特性，唯有結合在地、區域乃至跨國層面的知識譜系，才能真正理解其本質。我們當前最迫切需要的，是那種能抵抗簡化、進口、重複且往往陳腐框架的、嚴謹而細膩的研究。

說了這麼多，我也深知這絕非易事。制度與新自由主義的雙重壓力，不斷逼迫我們簡化伊朗

的政治與社會現實。我們不能將一切都歸咎於結構；學者與其他人一樣，都是受利益驅動的資本主義市場一份子，有時做出艱難的「選擇」代價高昂。在這些挑戰中穿梭，同時還要應對方法論與倫理限制、學科規範、離散政治及持續存在的守門機制，真是讓人精疲力竭。對於許多試圖在殘酷就業市場中生存的（尤其是職涯早期的）學者而言，這類認識論的決策早已與個人生活糾纏在一起。就像我們社會學家常說的：情況很複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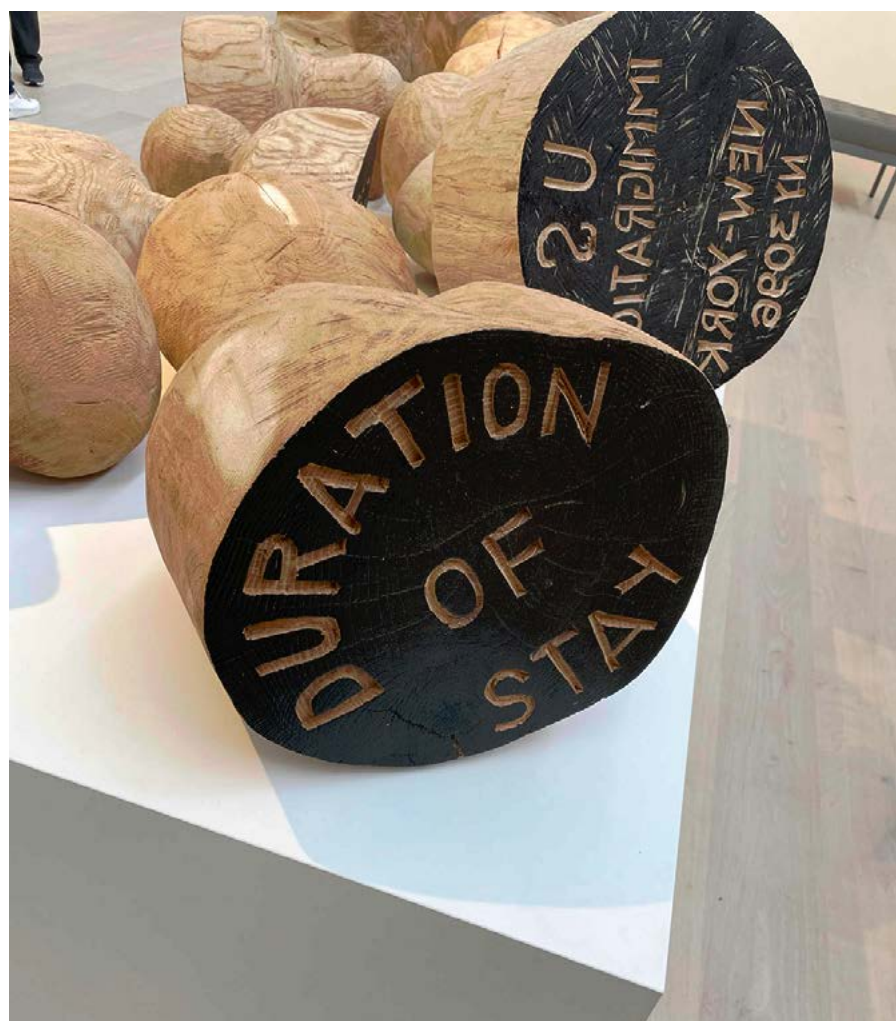
Mahbubeh Moqadam：Ladan 對於筋疲力竭的反思讓我深有共鳴。在我自身的研究中，我親眼見證了主流認識論如何限縮了何謂「有價值的知識」。我將研究紮根於跨國女性主義與反殖民視野，不將全球權力動態視為外部限制，而是將其視為伊朗知識如何被生產、流通與接收的核心。

身為離散學者，我受益於諸多形式的能見度——平台、語言優勢與出版機會——而這些往往是我所研究的、那些生活與反抗著的人們所無法獲得的。然而，制裁、美伊緊張局勢、審查與監控，依然持續限制著我或起檔案、進行田野調查，以及與伊朗學者合作的可能。與此同時，西方學術界傾向於賦予自由派與體制化知識特權——亦即那些以法律、政策或改革為核心的知識——卻忽視了情感、記憶、美學與日常抗爭的政治意義。我的研究堅持認為，這些較不易被解讀的實踐在政治上至關重要。這不僅是理論立場，更是對伊朗特殊處境及其催生出的抗爭創造策略的反映。

這也是一種倫理承諾：拒絕榨取式的框架，並轉而聚焦在植根於身體經驗的認知形式。這是一種女性主義式的拒絕——拒絕讓研究僅在由全球北方所定義的框架下，才被視為具備可理解性的。■

> 勞動遷移的 政治與社會經濟學

Karen Shire, University of Duisburg-Essen, 德國；
Heidi Gottfried, Wayne State University 以及拉塞爾塞奇基金會，美國；
Rina Agarwala,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美國



藝術展覽會的展品印章。
圖片來源：Karen Shire

數世紀以來，移民始終在機遇與詛咒這兩極間擺盪。從十五世紀至十九世紀，從歐洲遷往南亞、東南亞、美洲及非洲的移民潮，為歐洲移民提供了新的資源、土地與機會；然而，同樣的移民流動，對於移入國的原住人口而言，卻意味著征服、土地剝奪、疾病、暴力，甚至（在某些情況下）徹底的文化滅絕。十八至十九世紀間，從非洲與南亞被迫遷往非洲其他地區、亞洲乃至美洲各地的移民，為移入國的定居者帶來了財富，卻為移民自身及其後代帶來了慘無人道的暴力與尊嚴貶抑。今日，我們正見證著同一道難題

的另一種版本：對數十億人而言，移民是經濟生存與人身安全的唯一出路；但同樣的移民潮，卻為數十億本地人口帶來深層的不安全感與焦慮。這些緊張局勢正驅使一個接一個國家相繼陷入由仇恨煽動的右翼聯盟。現在是時候提出一套新的分析視角來檢視移民問題了，而社會學家正處於承擔這項挑戰的最佳位置。

本專題透過關注國家、政策、行動者，以及那些試圖透過境內或跨國流動改善生計的人所面臨的挑戰，深化對勞動遷移的政治與社會經濟的社會學



分析。以下文章源自 2024 年夏季於杜伊斯堡—埃森大學舉辦的「移民勞動國際政治經濟學」研討會，該會議由國際社會學協會經濟與社會研究委員會 (RC02) 及世界社會基金會 (World Society Foundation) 共同主辦。這些研究探討了：移出國及其外移政策、外資流動資本、城鄉遷移與跨境遷移的複雜交織（特別是涉及全球南方的流動）、移出國與移入國比較、高學歷與低薪遷移，以及上述因素如何形塑移民的期待與生命軌跡。文中涵蓋的國家遍及多元社會政治地理，揭示了世界體系中錯綜複雜的區域內與跨國移民潮。

> 分析移民—發展體制

移民社會學分析中的一項重要創新，是轉向將勞動力移民對移出國的角色與影響進行概念化。在這些國家中，經濟、社會與政治轉型與移民緊密結合，形成了 Agarwala 稱之為「移民—發展體制 (Migration-development Regime)」。

正如 Agarwala 在本專題首篇論文中所述，有三個核心問題引導著對該體制的研究（無論是對該概念最初的發源地印度，或是其他開發中國家）：第一，誰從移民中獲益；第二，移民帶來了什麼樣的後果；第三，移民與發展之間的關聯是如何不斷變化的。

揭示誰從移民中獲益，有助於正面形塑公眾輿論對移民的支持。審視移民的後果，特別是其與社會階級階層及精英聯盟的關係，能讓我們深入了解「移民作為增長模式」的運作方式及其對社會保障的影響。最後，研究移民—發展體制如何隨時間演變，則能為移民如何惠及社會發展提供替代性的想像。

在研究印度向海外低薪產業的移出移民時，Kumar 檢視了移出國與移入國之間是否存在雙邊協議——這類做法至少在名義上承諾能確保安全且有序的移民。然而，Kumar 發現這些協議未能充分考量印度移外勞工的健康與安全，部分原因在於他們在制定保護措施時，不僅沒有向移民組織與工會諮詢，也沒有讓他們參與其中。對印度政府而言，移出移民具備多重目的：在促進經濟發展的同時，確保其在國內外的政治合法性，並使大眾認同這種新的「新自由主義慣習」。

> 家務與照護勞動遷移

關於移工流動性的社會學研究長期以來一直在追蹤照護遷移的後果：一方面是原籍社群因人口流出而留下的照護缺口；另一方面則是目的地國的社會不平等，在那裡，剝削性的勞動條件根植於全球社會與種族的階層體系。本系列關於家務與照護遷移的論文，致力於對全球南方內部的流動進行跨國比較，並對農村向城市遷移，以及跨境移民進行比較研究。

Vega-Salazar、Moreno、Castiblanco-Moreno 和 Pineda 的研究顯示，拉丁美洲女性的「南南流動」模式，系統性地偏離了長期主導照護遷移研究的「南北流動」路徑。全球照護鏈並非單純的生殖勞動轉移系統。大批遷往哥倫比亞的委內瑞拉女性在移民時，往往帶著子女與其他受撫養的成年人，這意味著他們將原有的家庭照護責任一併帶到了異鄉。然而，在當地的照護工作領域中，流離失所的哥倫比亞女性同樣佔據重要地位，該領域普遍存在的非正規移民與非正式性，則嚴重影響了委內瑞拉移民女性的工作條件與生計安全。

Na 與 Ye 則比較了東亞與東南亞的模式，即中國內部的農村向都是照護遷移，以及從低收入國家前往新加坡的跨國性家務移工。在上述兩種語境中，「流動發展主義 (Mobile developmentalism)」的意識形態運作方式極為相似：它們皆將流動的家務移工定位為「較不現代」的一群人，從而認為他們不配獲得體面的工作，也不配受到那些聘僱他們的現代都市家庭的公平對待。

> 質疑對受過良好教育與技術移民的假設

兩篇投稿文章聚焦於對受過良好教育與技術移民的分析，這類群體在移民研究中仍相對被忽視，對於針對海灣國家移民的研究而言更是如此。Paul、Yavaş 與 Park 探討了他們對於中東、北非 (MENA) 及南亞移往杜拜之外籍專家移民的研究發現：杜拜是一個比傳統全球北方勞動市場更受青睞的目的地。儘管杜拜的職業發展與生活水準與全球北方無異，但來自中東、北非及南亞的外籍專家認為，杜拜的地理鄰近性便於家庭探訪，且對宗教與族群認同具備更高的包容性，使其成為比全球北方更好的首選目的地。然而，這種條件並不適用於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移民，他們在杜拜所遭遇的歧視與全球北方無異。像杜拜這種全球城市，是大量服務於菁英外籍人士的低薪移民吸納地，進而形成了一種不穩定的、女性化的再生產服務經濟。

Xu 比較了中國教育移民的動機，這些移民在中國境內以及跨國前往加拿大的流動中都十分活躍。過去的研究普遍認為，獲取加拿大公民身份或中國的城市戶口都記，是跨國及國內教育遷移的主要動機。然而 Xu 發現，農村教育移民更感興趣的是畢業後在中國城市勞動力市場的就業前景，而非戶口登記狀態的改變。與此同時，前往加拿大的教育移民，以及從中國農村移居加拿大的中國人，均偏好選擇永久居留權而非公民身份，因為外國國籍可能會限制他們返回中國的流動性，並削弱其過上跨國生活的能力。



> 中國在柬埔寨的影響力案例

Lai 與 Siu 的最後一篇文章特別關注中國在柬埔寨的直接投資——佔成衣業的 90%，並佔所有外資工廠的 55%——如何強化柬埔寨當地的威權資本主義模式。在這種模式之下，依賴外資的經濟增長被置於勞工權益與民主參與之上。雖然柬埔寨成衣工人持續與剝削抗爭，但隨著該國致力於提供廉價勞動力以吸引並安撫中國投資者，罷工事件已大幅減少。由此產生的移民—發展體制，與早期關於拉丁美洲及其他東南亞地區背景下的依附發展研究極為相似。

> 意識形態與政策決定了移民是促進社會流動，抑或僅強化了既有的階級結構

這些論文所揭示的未來移民社會學研究新路徑指出：移出國與移入國的國家角色，及其發展與投資模型，對於決定移民究竟是開啟社會流動與生計安全的契機，抑或導致本就脆弱的移民陷入不穩定生計的陷阱至關重要。社會階級、性別與族群因素——尤其當族群身份與原籍國與目的地國的收入水平差異重疊時——強烈地塑造了移民可能產生的後果。儘管受過教育的移民最有可能從中獲益，但這仍取決於他們在目的地勞動力市場中是被整合還是被排斥。

發展意識形態與政策，決定了移民究竟是開啟了社會流動的契機，還是固化了性別、階級和族群的層級體系。然而，關於安全且有序移民的國際治理，尚未能為從事低薪工作的移民提供公平和保障。此外，目的地國家的政策也未能向技術移民提供他們所追求的社會和政治保護。就邊界化以及包容與排斥的問題而言，境內移民與跨國移民的後果極其相似，兩者在諸如家庭、照護勞動以及低技術製造業等領域中相互交織。在越來越多的脈絡中，南南流動以及遷出與遷入並存的交會現象，進一步凸顯了我們迫切需要更多針對形塑全球移民經歷的制度與實踐進行深入研究。■

來信寄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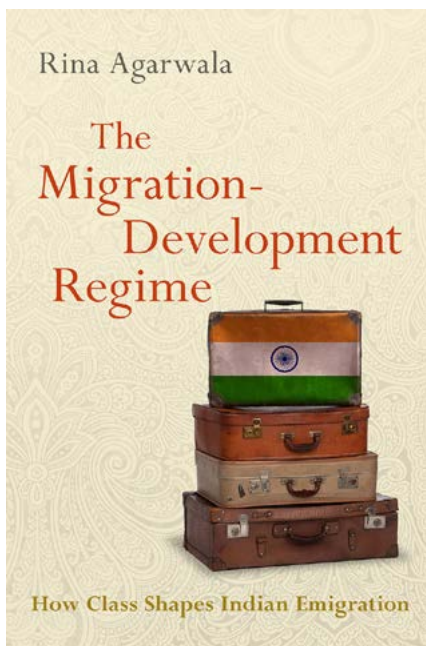
Karen Shire <karen.shire@uni-due.de>

Heidi Gottfried <ag0921@wayne.edu>

Rina Agarwala <agarwala@jhu.edu>

> 社會學領域對移民挑戰的貢獻

Rina Agarwala ·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美國



Rina Agarwala 的《移民發展體制》書籍封面，牛津大學出版社。

全球移民是本世紀最嚴峻的挑戰之一。此議題影響著選舉結果，人們對此的觀點更使國家、社群乃至家庭陷入分裂。那麼，社會學如何協助我們應對這項挑戰？

數十年來，社會學家引導我們將視角從單純觀察個別移民，轉向理解催化國內與全球移民流動這類更廣泛經濟社會力量。理解這些結構性因素有助於釐清：誰在遷移、他們如何遷移、遷往何處，以及為何人們甘願承擔代價與風險仍選擇遷移等問題。例如，社會學家分析了促使特定族群做出艱難且往往危險的決定——離開家園與親人——的各種「推力因素」，包括經濟貧困、疾病爆發、土地剝奪與暴力衝突。社會學家亦強調了各種「吸引因素」——例如法律與制度框架、勞動力需求——這些因素促使人們選擇特定能接納移民的地區而非其他地區。社會學家深知人類並非純粹的理性行為

者，因此亦研究了各種中介過程——例如族群網絡、文化親和力、家庭層級決策組合——這些因素即使在遷移路徑並非最具成本效益或毫無風險時，仍能驅動特定移民流動。

但身為社會學者，我們不能就此止步。在近期著作《[移民發展體制：階級如何塑造印度移民](#)》中，我提出移民發展體制（Migration-Development Regime, MDR）的新分析框架，運用社會學從三個重要面向拓展研究視野。

> 誰從移民制度中獲益？

首先，我們必須運用社會學對權力的理解，揭露那些不單只有承受損失、但同時也由移民群體中獲益的非移民行為者。儘管圍繞移民的公眾與政治爭議已表明，移民的影響顯然遠超實際遷徙的人群，當前的辯論卻往往聚焦於所產生負面的成本。但若能精確指出非移民群體中的受益者及其獲益方式，將更能解釋為何移民潮在成本與風險並存下，仍持續流動。而凸顯這些受益者及其獲益途徑，是有助提升公眾對移民的支持度。最終，揭露這些受益者與利益關係，更能精準界定需要保護的領域。

那麼是哪些非移民群體從移民中獲益呢？全球移民案例顯示：本地雇主常透過廉價移民勞動力在有償生產領域獲取經濟利潤，並實現基於種族與性別的社會地位流動。社會學研究亦揭示：本地家庭藉由依賴移民照料長者、幼童乃至自身，在有償與無償的生殖領域中擴張了基於種族與性別的權力。

MDR框架凸顯了移民社會學研究中常被忽略的另一受益者：國家。自二十世紀初以來，接收國與輸出國的「移民國家」始終掌控著誰享有跨越特定國界的權利。儘管「跨國主義」概念日益受到關注，民族國家仍是唯一具備合法權威來規管、限制與治理跨境人口流動的主體。然而此類治理代價高昂，國家為何仍堅持推行？本文以印度自1833年至

今作為移民輸出國的案例為例，闡明印度政府如何持續將移民外流作為實現國內經濟增長、鞏固政治合法性（涵蓋國內與國際層面），以及為新規範、習慣與實踐爭取社會認同的媒介。例如，印度移民曾協助宣傳二十世紀初的反帝國主義與反種族主義運動，以及1970年代的民主運動。近年來，往返印度與海灣地區的貧困移工，更在傳播創業精神與自給自足理念的同時，形塑出全球性世界公民的身份認同。

然而，未來研究仍有若干關鍵問題需被解答。越來越多國家同時扮演移民輸出國與接收國的雙重角色，那它們如何調和這些相互衝突的職能？國家層級的移民治理體系與次國家級單位的移民治理體系存在哪些差異，又可能產生哪些衝突？而，移民治理框架是否要求我們打破當前國內移民分析與國際移民分析之間的壁壘呢？

> 移民制度的具體後果究竟為何？

其次，透過凸顯移民的實際受益者，我們也能更精確地揭示移民的具體後果（無論預期與否）；進而更能凸顯那些待解決的問題本質。

以印度為例，我運用MDR框架論證：自1830年代至今，印度國家的移民政策與實踐所產生的關鍵後果，在於持續加劇並鞏固印度公民間基於階級的不平等。例如，英國殖民當局在1833年廢除奴隸制後，鼓勵貧困印度勞工外移擔任種族化的勞動力（包括契約傭工、非正式僱傭及中產專業職位）。然而自1900年代至今，印度政府一方面以法律限制貧困公民海外移居，另一方面卻允許精英階層自由遷徙。這些流動限制雖打著保護與民族主義的旗號，實則構成我所稱的「家長式保護」，進而深化了印度國內乃至全球的階級不平等。

與此同時，自1980年代以來，印度國家賦予其精英移民與印度商界及政府領袖建立所謂「精英契約」（elite pact）的權能，此舉首次自19世紀以來重塑了印度在全球資本主義秩序中的定位。基於印度政府的移民政策與實踐，印度裔美國人尤其成為關鍵的跨國媒介，將新自由主義理念與私有化、自給自足、意志主義（voluntarism）等實踐模式，從美國精英圈層傳遞至印度精英階層。此舉重塑了印度企業、公民社會組織、教育體系、醫療保健、稅法規範及房地產市場，使印度蛻變為新型全球經濟行為體。英國那位印度裔、印度教背景的前首相，正是此類跨國媒介滲透親密領域的典範——他娶了印度公民為妻，其妻恰是印度最成功資訊科技公司創辦人的女兒。

然而關鍵問題仍待解答：若MDR框架能揭露階級不平等，是否也應揭示移民制度中基於種姓與性別的後果？移民國家如何在歷史進程中鞏固這些階層結構？

> 移民制度如何改變？

最後，作為社會學家，我們深諳結構與能动性之間錯綜複雜的動態關係，深知權力既可自上而下施加，亦可自下而上運作。因此，MDR框架將移民國家視為鬥爭場域，而非靜態實體。在移民研究中，我們不僅需揭示政治經濟結構如何自上而下塑造移民，更須呈現移民如何自下而上重塑國家與經濟結構。正因國家與移民間存在此種辯證關係，移民治理制度隨時間演變。以印度為例，本書追溯了自1830年代至今三種截然不同移民治理制度的興衰歷程。未來研究應追溯各國及次國家區域移民發展路徑的歷史轉變，並藉此歷史軌跡構思多元的未來可能性。

數十年來，社會學家們對我們理解全球移民現象作出了重要貢獻。然而當代挑戰正呈現新態勢，我們的研究極需注入新思維。MDR框架提供了一種新工具，有助於拓展未來的研究視野。■

來信寄至：

Rina Agarwala <agarwala@jhu.edu>

> 印度國家機器如何想像與落實 安全且有秩序的移民

Ashwin Kumar，康乃爾大學，美國。



飄揚的印度國旗。圖片來源：Ragu Raja，由Pexels提供。

過去幾十年來，大量文獻探討了國家，特別是移工輸出國，在管理移民以達成各種政治與發展目標上所扮演的角色。對於安全且有秩序的移民之呼籲，是伴隨著移民與發展如何相互連結的論述而產生的。2015年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以及2018年通過的《全球移民契約》（Global Compact for Migration），勾勒出「安全、有秩序且負責任的」移民典範。

本文探討此框架在實務上的現實情況，以及國家與地方政府如何構思並執行相關計畫以達成這些目標。具體而言，我檢視了全球最大的移工輸出國—印度，如何透過向潛在移工傳授具備市場價值的技術，來展望安全與符合倫理的移民。為此，我訪談了主要移工輸出地區（德里、喀拉拉邦與泰倫迦納邦）的勞工組織，以及聯邦與邦層級的技術和招募機構。

> 「技術與移民生態系統」在 安全且有秩序移民上的承諾與限制

正如 [Rina Agarwala](#) 所主張，無論是殖民時期或後殖民時期的印度政府，向來都會介入並參與其移民人口的事務，以實現自身的發展目標。這種介入的主要方式之一，便是確保移工的安全。

近年來，印度政府試圖透過提供移工具市場價值的技術，並透過與接收國談判達成的雙邊勞動力協議（Bilateral Labor Agreements, BLAs）之官方管道來輸出移工，藉此促進符合倫理的招募。儘管這些協議的執行力有限，但其宗旨在於確保雙方就安全與合倫理的招募實踐，以及目的地國家的工資與工作保障，達成一套雙方同意的規範。截至2025年2月，印度聯邦政府及部分邦政府已與[德國](#)、[以色列](#)和[日本](#)等國簽署了以技術為基礎的雙邊勞動力協議，涵蓋建設、電機、技術工作及醫療照護等廣泛的職業與產業。印度政府主張，透過這些協議，他們也能藉由監督與偶爾的[合作](#)，更好地控制仍主導招募市場的私人仲介機構運作。新的參與者（即[聯邦與邦政府機構](#)，以及私立技術發展機構）如今已進入了這個「技術—移民」生態系統。

>>

然而，在印度支離破碎的聯邦制移民管理框架內，實施這些計畫充滿挑戰。聯邦與邦層級的行動者不僅追求不同的目標與策略，政治立場也各異，導致在執行過程中產生了競爭與混亂。我對聯邦與邦層級技術培訓機構的訪談顯示，它們之間競爭激烈，不僅相互爭奪合約與機構聲望，還要與數量龐大的現有私人招募和技術培訓機構競爭。這導致他們缺乏合作，並在移工技能培訓標準上造成混亂。例如，近期簽署的「印度－德國」協議要求在進行招募前，必須達到嚴格的技能與語言培訓標準；然而，歷史較悠久的「印度－以色列」建設勞工協議，卻僅要求進行粗淺的任務導向測試。

> 前往危險地區進行「安全」遷移的實務性與倫理

事實上，印度－以色列協議引發了關於何謂安全與合乎倫理之勞動力移民的巨大爭議。當我向官員質疑將印度工人送往武裝衝突區域的安全性時，聯邦與泰倫迦納邦機構皆以他們有確保政府嚴格監督來為其決定辯護。他們表示，工人將獲得優渥的薪資，該協議甚至涵蓋了他們的食宿。萬一工人陷入危險處境，印度領事館將照顧他們的需求，包含在必要時進行撤離。

另一方面，喀拉拉邦的機構確實對該雙邊協議的安全性與倫理提出了質疑。相較於聯邦政府對該衝突採取較為模稜兩可的立場，喀拉拉邦首席部長於2023年12月正式譴責了以色列對加薩的攻擊。喀拉拉邦政府的招募機構證實，在首席部長發表聲明後，他們拒絕在該協議下將工人送往以色列。正如一位喀拉拉邦的政府招募專員所主張的：

「我們（政府機構）應該專注於將工人合乎倫理地招募至各個目的地。將他們送往激烈的戰區，完全違背了任何形式的倫理！」

印度政府無力保護工人的程度，也明顯體現在僱用與解僱的實務操作上。首批工人抵達以色列幾個月後，一份調查報告發現，近2,000名印度工人被當地的以色列承包商解僱，導致許多人完全被驅逐出以色列。雇主以「缺乏技術」作為解僱的理由。而政府對此情況幾乎無能為力，無法進行補救。這一事件揭露了該計畫在促進「安全、有秩序且負責任」移民之願景中的幾處裂痕。

> 納入勞工聲音

最後，除了聯邦與邦政府之外，公民社會也至關重要。傳統上，勞工組織、公民團體以及跨國勞工網絡在捍衛移工權利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我的訪談顯示，隨著政府對移工勞動力的管理擴張，移工組織者的聲音卻被削弱了。例如，印度工會反對印度與以色列的協議，主張助長對巴勒斯坦人持續的壓迫是完全不道德的。然而，工會與其他移工組織證實，在制定這些協議的過程中，政府並未諮詢他們的意見。

組織者指出，任何邁向移工安全與合倫理招募的舉措，都需要考量在第一線捍衛移工權利的人們的洞察。在全球邊境日益緊縮的背景下，將他們納入討論變得愈發重要，尤其是在跨國層級。除了培訓移工並將他們與有意願的雇主進行媒合之外，任何實現安全且有秩序移民的希望，都需要一個更具包容性的願景，以確保移工的權利。■

來信寄至：

Ashwin Kumar <ak2398@cornell.edu>

> 跨越國界的關懷： 移民至哥倫比亞的委內瑞拉女性

María Camila Vega-Salazar，安地斯大學，哥倫比亞；Carolina Moreno，安地斯大學，哥倫比亞；
Suelen Castiblanco-Moreno，德拉薩大學，哥倫比亞；以及 Javier A. Pineda D，安地斯大學，哥倫比亞。



森林中的安置帳篷，衣物晾曬在人行道上方。
圖片來源：Luna Andrade Arango，由Pexels提供。

—— 十一世紀之交，社會學家 Arlie Hochschild 提出「全球照護鏈」概念——指女性跨越國界轉移照護責任，通常從較貧窮國家流向較富裕國家的跨國網絡。這個概念激發了一個蓬勃發展的學術領域，深入剖析性別、階級與移民如何與照護工作相互交織。既有研究多聚焦在南北移民：全球南方女性移居富裕國家以滿足日益增長的照護需求。然而當照護鏈在南方國家內部運作時，又會產生何種現象？拉丁美洲學者正深入探究此議題，揭示智利、巴西、阿根廷乃至近期哥倫比亞等國間錯綜複雜的移民與照護模式。

本文將焦點轉向「南—南遷移」，並以自 2015 年以來大量遷移至哥倫比亞的委內瑞拉女性為案

例。截至 2023 年底，已有將近 290 萬名委內瑞拉人移居哥倫比亞，其中女性人數略多於男性。這些女性中的許多人不僅要應對不穩定的移民政策和充滿敵意的勞動市場，還要肩負有酬與無酬的照護角色。

我們的核心論點是，必須對全球照護鏈理論進行修正，以反映全球南方區域性、女性化且通常具有循環性遷移流動的現實。這些照護動態並不總是遵循在較富裕國家觀察到的相同模式。例如，女性移工經常與孩子一起旅行、在目的地國組成多代同堂的家庭，或是繼續在她們自己的家庭內提供照護。在這些脈絡下，照護工作是被重新配置的，而不僅僅是被轉移。



> 哥倫比亞的照護工作：一個複雜的地景

長期以來，受武裝衝突所引發的內部流離失所深刻形塑了哥倫比亞社會，造就大量女性從事非正式照護與家務勞動。如今該國更成為國際移民，尤其是委內瑞拉女性的主要目的地。

起初，哥倫比亞政府以人道救援的方式來應對委內瑞拉人的湧入。隨後，政府引入了合法居留正常化的機制，特別是「臨時保護許可證」（Temporary Protection Permit, PPT），提供了工作機會與基本服務的管道。然而，行政延宕、政治意識的轉變以及有限的執法力度，使得許多移民缺乏合法文件，並容易受到勞力剝削。

這在照護經濟中尤其明顯。根據哥倫比亞官方家庭調查（GEIH）的數據，我們發現，儘管委內瑞拉女性的教育程度相對較高，但她們在房務、餐飲與零售等低薪、非正式部門的比例卻不成比例地高。令人意外的是，家務工作並不是這些女性的主要就業領域。這個角色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哥倫比亞國內流離失所的女性所填補，這反映了哥倫比亞的內部衝突如何塑造了其自身的照護勞動市場。

從事家務工作的委內瑞拉女性通常比哥倫比亞籍同業更年輕且教育程度更高，但她們面臨更高的非正式就業率，並被排除在社會保障之外。例如，在 2023 年，有 40% 的委內瑞拉家務工人沒有醫療保險，且儘管她們承擔全職工作量，卻只有 7% 的人加入了退休儲蓄系統。她們大多數只有口頭勞動契約，這進一步加劇了她們不穩定的處境。

> 數據之外：女性主義的批判

本研究呼籲採用更具交織性的取徑來分析照護工作。性別並不是唯一發揮作用的變數。國籍、合法身分、種族、年齡與教育程度相互交織，共同塑造了照護責任的分配方式，以及誰會被排除在外。

委內瑞拉的案例也引發了對當前移民與勞工政策永續性的質疑。哥倫比亞從人道援助轉向「社會經濟整合」的政策目標，至今尚未轉化為對女性移工具實質意義的保護或工作機會。最近，政治風向的轉變導致了呼籲委內瑞拉人自願返國的聲音，儘

管該國仍持續處於動盪之中。

我們主張，哥倫比亞等國家不應依賴臨時許可證與政治裁量權，而需要制定健全且永久的移民政策，以認可照護工作的價值，並確保提供照護者（無論其文件狀態為何）的權利。

> 反思全球南方的照護鏈

這項研究充實了日益增加的拉丁美洲學術文獻，這些文獻挑戰了以歐洲為中心的照護移民模式。我們不能預設勞動力是從南方流向北方的單向流動，而是必須承認區域脈絡中動態且多層次的照護現實。在哥倫比亞，照護既是輸出的也是輸入的：雖然許多哥倫比亞人作為移民逃離了該國，但該國也正接收大量來自國外的照護勞工。

此外，全球南方的照護工作往往受到流離失所、不平等與國家忽視的影響。這不僅僅是就業問題，更是女性之間的生存與社會連帶問題。照護工作透過非正式網絡、家庭安排與社區策略來分配，通常缺乏國家的支持。

在哥倫比亞的委內瑞拉女性正在重新定義作為移民與照護者的意義。她們的經驗挑戰了全球照護鏈的簡化模型，並邀請我們不僅將照護視為勞動，更將其視為政治鬥爭與社會轉型的場域。透過記錄這些現實，本研究呼籲建立一個更接地、更具包容性的移民與照護社會學，將在移動中生活之女性的聲音與主體性置於核心。■

來信寄至：

María Camila Vega-Salazar

<mc.vega611@uniandes.edu.co>

Carolina Moreno

<camoreno@uniandes.edu.co>

Suelen Castiblanco-Moreno

<secastiblanco@unisalle.edu.co>

Javier A. Pineda D.

<jpineda@uniandes.edu.co>

> 「流動發展主義」式的 中國和新加坡移民照顧勞動力

Lynn Yu Ling Ng, York University, 加拿大和 Yunhui Ye, University of Victoria, 加拿大。



家庭勞工的假期。
圖片來源：Rex Pe, 由創用CC CC BY 2.0提供。

2019年爆發的新冠疫情使照護工作以及我們對移民家事勞工的全球性依賴再次受到關注。然而，儘管存在共同的困境，這些勞工的經驗卻很少在不同國家情境之間被加以分析。在東亞、歐洲，以及在中國和印度這樣的大國之中，關於此議題的學術研究已經有活躍的發展趨勢，但在主流研究主題中仍然相對邊緣。我們透過將中國的家庭照護工作者（domestic care workers, DCWs）與新加坡的外籍家庭勞工（foreign domestic workers, FDWs）的案例，參與到此重要的討論之中，以揭示相似的經濟發展策略如何創造出類似的剝削形式。

> 視農村／傳統為「落後」、 城市／現代為「優越」的過時模型

在《Work Organisation, Labour and Globalisation》期刊即將推出以「家庭空間」為主題的專刊，我們將發表〈Same but Different:

Care Labor Migration in China and Singapore〉一文。該文中，我們借鑑女性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成果與線上民族誌研究，比較跨越國界的家務勞工經驗，揭示根植於發展意識形態中的共同剝削模式。我們說明了一種我們稱之為「流動式發展主義（mobile developmentalism）」的情境：這是一種線性且分階段的發展意識形態，其依循流行的現代化理論，將農村／傳統的人與城市／現代的人分別建構於較低等與較優越的地位。

移民的流動性受到此類社會階級制度的影響。在中國，農村家務勞工因被認為具有較低的「素質」（suzhi, 人品）而受到歧視。在新加坡，外籍家庭勞工（FDWs）被理解為來自亞洲「較不發達」的地區。這兩群移民女性都受到我們所稱的「流動式發展主義」所支配；在這種殖民式文明排序中，某些人被視為天生就比他人更「現代」或更「發達」。

這種排序體系並非偶然。它源自戰後的現代化理論，該理論讚頌從「落後的」農村／傳統社會走向「先進的」城市／現代社會的線性發展。無論勞工是跨越國際邊界移動（新加坡案例），或是在國內的城鄉分界之間移動（中國案例），他們都面臨類似的對其人性與勞動價值的貶低。

> 理解照護危機

國家利用發展策略來正當化對女性及其所從事的照護工作的貶低。經濟現代化與「提升」國家發展的目標，是整體圖像中的重要部分，但並非唯一因素。在女性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研究中，對於照護工作如何被系統性地貶低已有相當豐富的學術討論。無論是中國農村女性還是亞洲移民女性，照護勞動都因為性別化意識形態被忽視且容易被剝削；這些意識形態將有色女性描繪為天生特別適合為他人服務。這種現象反映了全球對照護工作價值

的普遍缺乏。照護被視為女性的「天職」：一種由「愛」所驅動、似乎可以無限供應且自由流動的資源，而不是一種應當獲得公平報酬的勞動。

> 素質(人格品質)的概念與「較不發達」的亞洲

中國的戶口(hukou, 戶籍)制度建立於1950年代, 形成了一種制度化的城鄉隔離。農村移民可以在城市工作, 但無法獲得城市福利, 例如醫療保健、子女教育或社會保障。素質(suzhi) 論述將農村人口描繪為「低素質」: 缺乏文明素養、阻礙中國的現代化進程, 進一步強化了這種隔離。

一位家庭照護工作者曾勇敢地對此提出挑戰。當她的雇主拒絕給她元旦假期時, 對方問道: 「作為一個保姆(Baomu, 對家務勞工的貶抑性稱呼), 你有什麼權利要求法定假日?」她反駁道: 「保姆難道不是中國公民嗎? 如果是, 那她們就有權享有法定假日。」她的反抗最終讓她失去了這份工作。

在新加坡, 外籍家庭勞工則面臨種族歧視, 因為他們來自「較不發達」的亞洲國家。招聘網站像商品比價一樣展示她們的照片、個人資料和「技能」。國家規定的強制同住政策以及雇主擔保制度——類似於卡法拉制度(kafala system)——建立了一種依附關係, 使得勞工即使在面臨虐待時, 也難以輕易更換雇主。

中國的勞工是在自己國家內部移動, 相同族裔的公民。他們在新加坡的同行則是跨越國界的外國公民。這兩個群體都面臨類似的挑戰。

法律脆弱性 (Legal Vulnerability): 在中國, 超過90%的家務勞工缺乏正式的雇傭契約, 因為只有公司而非家庭可以被承認為雇主。同樣地, 雖然新加坡的外籍家庭勞工(FDWs)有勞傭契約, 但她們被歸類為簽證最低級別的臨時「外來工(guest workers)」, 且每兩年要續簽一次。

同住剝削 (Live-in Exploitation): 這兩類家事勞工通常都與雇主家庭同住, 因此被期望24小時待命。一位新加坡的外籍家庭勞工(FDW)分享說: 「我凌晨四點起床做早餐[...] 我的休息時間從晚上11點到午夜12點, 取決於他們下班回家的時間。」一位中國的家務照護工作者的詩中寫道: 「當我的頭碰到枕頭時, 已經是十一點。筋疲力盡, 滿身汗水, 我躺在床上, 思念著家。」

去人性化的對待 (Dehumanizing Treatment): 這兩個群體都面臨根植於發展意識形態的居高臨下態度。中國的雇主批評家務照護工作者的普通話「不標準」, 並強迫她們練習說話標準。新加坡的雇主則認為外籍家庭勞工(FDWs)需要「管教」才能適應城市生活, 批評她們的衛生習慣、對現代電器的熟悉度以及「悠哉」的農村生活方式。

> 私人空間與發展意識形態下的剝削: 將移民照護工作者視為較不值得尊嚴與保護的人

我們的比較視角關注國家層面在國際移民中的作用。無論是國內移民(中國)還是國際移民(新加坡), 都揭示了不同尺度與情境下的發展意識形態。兩者都創造了可以稱為「家庭空間」的情境: 在這些私人空間中, 剝削在超越公共監督與勞動規範的環境下滋長。全球發展策略創造了地方階序, 為將某些群體視為可隨意處置的勞動力提供了正當理由。無論這種正當性是基於城鄉發展差距或是國際發展差距, 結果都是相似的: 女性的照護工作成為一種商品, 被榨取以支持其他家庭的社會再生產。

理解流動式發展主義有助於我們看到看似不同情境之間的連結。中國的家務照護工作者(DCWs)為基本勞動權利而奮鬥, 新加坡的外籍家庭傭工(FDWs)為公平待遇組織行動, 她們面臨的挑戰相似——這些挑戰根植於發展意識形態, 將她們定位為天生較不值得尊嚴與保護的人。

最終, 認識這些相似之處有助於開啟跨國及關係性的團結與跨情境學習的可能性。這兩群女性展現出非凡的韌性, 利用線上空間分享經驗、提供相互支持, 並記錄不公。她們的聲音挑戰了對照護工作與勞動剝削的主流貶低, 並要求對她們的完整人格給予承認。■

來信寄至:

Lynn Yu Ling Ng <lynnngyl@yorku.ca>

Yunhui Ye <yunhuiye@uvic.ca>

> 杜拜對非西方外籍人士的獨特吸引力

Anju Mary Paul、Mustafa Yavaş 和 Sejin Park，New York University Abu Dhabi，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白 從 Saskia Sassen 的經典著作將紐約、倫敦和東京描述為全球城市以來，其他全球城市也被辨識並進行排名，而這些排名在很大程度上是依據經濟標準來進行的。作為企業全球化的節點，全球城市聚集了許多由高技術移民所經營的領先跨國企業。在這些城市競相吸引人才的過程中，評估和排名它們的分析師，甚至試圖推廣它們的政策制定者，往往傾向使用普遍化的標準，彷彿所有外籍人士都符合相同的模式——只追求高收入、舒適的生活方式以及更高的安全性。即使是對全球城市文化意義的評估，也往往以它們擁有多少博物館和地標來衡量。

我們提出一個問題：全球城市是否還有其他「獨特」的特質，能夠提升其對特定高技術移民群體的吸引力。為了回答這個問題，我們考察了杜拜的案例，這座在全球城市排名中迅速崛起的城市。透過對在杜拜的非西方移民專業人士進行問卷調查與深入訪談，我們發現，杜拜同時作為一座全球城市與一座「在地」城市，對來自南亞、中東與北非（MENA）地區的外籍人士具有獨特的吸引力。

作為一個典型的全球城市，杜拜提供了：(1) 更高的經濟收益、(2) 更高的生活水準，以及 (3) 更高的安全性——而這些通常是移民所聯想到的特徵，也是被建構出的「全球北方」的樣貌。但杜拜同時也為這些移民提供「在地」的好處：(4) 地理位置上靠近他們的原籍國；(5) 文化上的熟悉感，因為當地有來自這些地區、規模龐大且歷史悠久的移民人口；以及最後 (6) 對這些移民的特定宗教與種族身分具有更高程度的包容。

> 杜拜的背景

擁有350萬人口的杜拜，是阿拉伯聯合大公國（阿聯酋）最大的城市。在過去二十年間，杜拜迅速發展為跨國企業在中東與北非（MENA）地區營運時首選的區域總部所在地。這座城市以自己是中東地區最具商業友善度、最自由開放的樞紐而自豪，並且在公共安全、對政府的信任度，以及宜居性方面持續獲得高分，而這些都是評估城市對外籍人士友善程度時常用的標準。

同時，杜拜（以及阿聯酋其他地區）仍然嚴重依賴外籍人士來維持其經濟成長。在2023年，杜拜人口中有 92% 為非阿聯酋公民。雖然人們對杜拜外

籍人士的普遍印象多是來自西方的人，但實際上，更多的人是來自南亞以及中東與北非（MENA）地區。

> 另一種類型的外籍人士

為了評估杜拜的相對吸引力，我們對來自阿聯酋週邊三大區域（南亞、MENA及撒哈拉以南非洲）的高技術移民進行了調查和訪談。我們將北非國家視為屬於MENA的一部分，並與非洲其他地區分開處理，因為這些國家的人們說阿拉伯語，並且在族裔上被視為阿拉伯人。

我們的調查數據顯示，在移居之前，三個受訪群體都對搬到阿聯酋表現出強烈的意願（平均分為3.68分，滿分為5分）。然而，來自南亞與MENA的受訪者，比起來自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移民，表達出更強烈希望繼續留在阿聯酋的意願（3.35分對2.71分）。這種差異與這三個群體在比較阿聯酋的生活與先前所在國家的生活時，所感受到的滿意度不同有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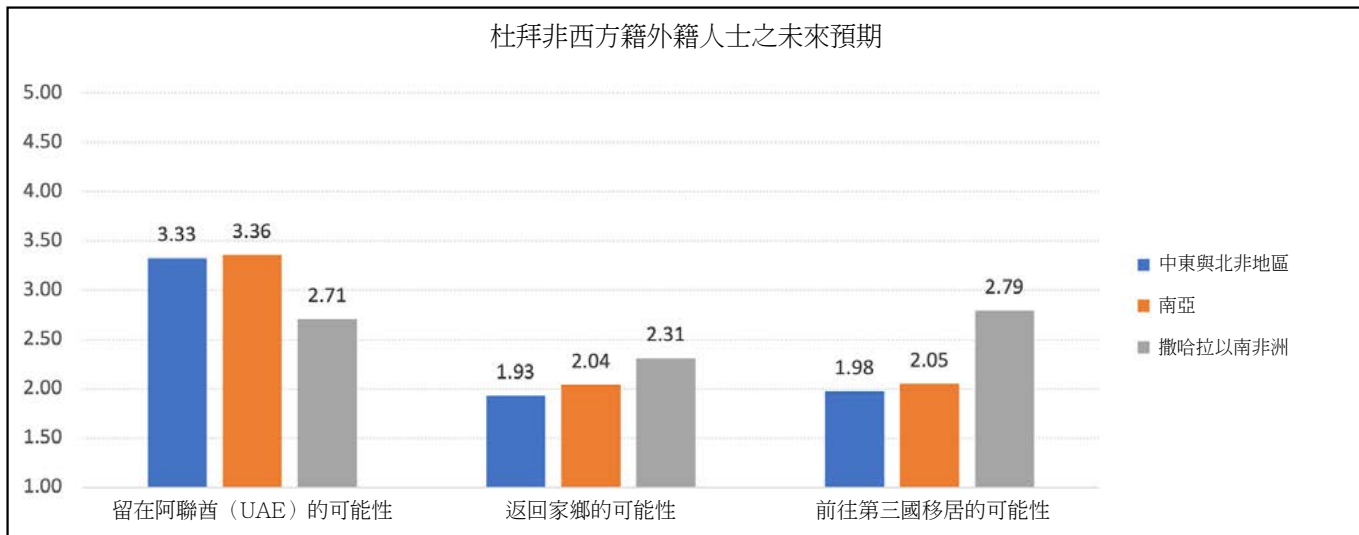
雖然來自南亞與MENA的受訪者在抵達阿聯酋後，在職業發展、生活水平和文化熟悉度這三個關鍵面向上，感受到顯著的提升；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的受訪者僅在工作和生活水平方面感受到顯著改善，在文化熟悉感方面則沒有，原因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的社群規模較小。因此，相較於另外兩個群體，來自撒哈拉以南地區的受訪者更傾向於離開阿聯酋，前往第三個國家繼續遷移。

> 杜拜的經濟、生活方式與安全優勢

我們對46位在來到杜拜之前曾居住於其他海外地區、具有全球流動性的專業人士進行深入訪談，這有助於進一步解析這些不同的觀點。這三個群體都強調他們在杜拜所享有的經濟利益、舒適的生活方式以及更高的安全性。這些優勢適用於所有在阿聯酋以外籍身份工作的高技術移民，無論其原籍國為何。杜拜為外籍專業人士提供的經濟收益，有時甚至可能超過他們在西方國家從事同等職位所能獲得的收入，部分原因在於阿聯酋的增值稅較低，且沒有個人所得稅。

受訪者強調了杜拜的高生活水準，包括完善的公共基礎設施以及較高的公共安全感。此外，他們

杜拜非西方籍外籍人士之未來預期



資料來源：Anju Mary Paul, Mustafa Yavaş 和 Sejin Park

還強調，由於來自亞洲與非洲的大量低薪勞動移民流入阿聯酋，從事照護與服務業工作，他們能輕鬆取得負擔得起的家務勞動力。這些特徵反映了杜拜名副其實的「全球城市」地位，該城市在勞動市場的高階與低階均擁有大量移民人力。

> 杜拜：兼具兩種優勢的城市

來自南亞與MENA的受訪者也細說到，杜拜與他們原籍國的地理位置接近，這使他們能夠享受頻繁（且負擔得起的）回家探親，或讓親屬透過阿聯酋寬鬆的旅遊簽證來探訪他們。鑑於阿聯酋長期聚集著來自這兩個地區的中產階級移民群體，也隨著這些社群發展起來的各種文化與社會機構，南亞與MENA的外籍人士經常強調杜拜的文化熟悉感，提到各種便利設施（從清真寺、提供清真與民族飲食選擇的超市與餐廳，到教授原籍國課程的學校），這些都使杜拜對他們而言感覺「像家一樣」。

最後，這些受訪者談到，阿聯酋對他們的宗教與種族身份有更高的接受度，這是他們在許多北方的國際城市中感受不到的。相比之下，來自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受訪者則更可能談到在阿聯酋遭遇的種族歧視，或者只是因為缺乏同階層的大型同族社群而感到孤單。

總體而言，我們的研究結果凸顯出，全球/世界城市的學術研究需要考慮這些城市中高技術移民的多樣性，而不是假設外籍人士都是同質的。在讓特定移民群體在海外感到「像家一樣」時，應該更多地承認城市的社會與文化特徵，而不僅僅停留在表淺的世界主義概念上。■

來信寄至：

Anju Mary Paul <anju.paul@nyu.edu>

Mustafa Yavaş <mustafa.yavas@nyu.edu>

Sejin Park <sejin.park@nyu.edu>

> 中國教育移民的 本土、海外與歸國歷程

Feng Xu, University of Victoria, 加拿大。



高考 (Gaokao), 湖北日報, 資料來源:
http://m.cnhubei.com/content/2019-06/08/content_10844871.html

眾 多中國年輕移民透過追求優質教育實現社會向上流動。本研究聚焦國內外教育移民及「歸國者」群體。研究聚焦於他們爭取當地居留身份的親身經歷：上海或北京戶口 (hukou)，以及加拿大永久居留權。儘管加拿大公民身份在功能上可能比永久居留權更接近戶口制度，但受訪者幾乎未提及公民身份；投票權不被討論，而加拿大公民身份反而使回訪中國或未來歸國更為複雜。

2024至2025年間，筆者於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省 (British Columbia) 訪談十二名、於中國北京與上海訪談十五名中國教育移民。多數受訪者生於1990年代，未婚者居多，女性佔多數，且皆具就業或求職狀態。

>>

中國教育移民海外人數（2000-2022）



中國與全球化中心，改編自《中國留學生的發展》（2023-2024）。

資料來源：<https://web.archive.org/web/20240514045418/http://www.ccg.org.cn/archives/84327>

另，本研究中為何將兩組人納入同一研究？首先，包容與排斥的「邊界實踐」既發生於國境線，亦存在於國土內部。其次，國內與國際遷徙經驗存在交疊。最後，教育與社會流動之間的連結並非一帆風順。

> 流動、交疊的移民經驗

我的訪談顛覆了「本土」與「海外」移民間的二元對立。除三名「內部移民」外，其餘受訪者皆曾留學海外後「歸國」，但無人返回故鄉。與此同時，數名定居北京或上海的「歸國者」亦視這些城市為過渡居所，儘管眾人皆認同這些都會區具備國際化、高度發展且令人嚮往的特質。

多數加拿大受訪者希望定居當地，但即使持有永久居留權者仍會返鄉探訪中國親友，部分人更積極規劃待父母年邁時永久歸國。（近期研究顯示全球逾80%教育移民最終返鄉。）整體而言，教育移民的經歷呈現出臨時性、流動性、交疊性與複雜性。

> 空間不平等與教育流動性

我的受訪者成長於改革時代的中國，那是一個流動性極高的社會。支撐他們抱負的空間流動性，映照出了尖銳的地域不平等。這種流動性依賴於中國在政策上放寬了戶口制度與護照政策、接收主辦

國政府開放的人才招募策略，以及更便捷、更廉價的交通通訊手段（高鐵、航空、社交媒體）等方式嘗試達成政策目標。

當這些教育移民遷徙時，更廣泛的遷移壓力往往改變了他們的故鄉。中國東北的去工業化導致工廠關閉，迫使人口外流。市場與國家驅動的城市化在其他地區根本性地改變了社會結構。勞動力移民常為家鄉親屬建造新房。原先故鄉因緊密的社會關係而被人們銘記，如今卻也成為被遺棄之地。

研究中對北京與上海的偏好可能受招募標準影響，但此現象並不令人意外。上海或北京戶口持有者更容易進入國內頂尖大學。相對地，像本研究中來自農村或小鎮的頂尖移民受訪者，通常至少從國中階段就開始離鄉求學並寄宿。

高考（全國大學入學考試）的準備過程耗盡心力，需要大量隱形且被低估的支持：寄宿學校的付費工作者，或是家長（多為母親）。未寄宿者可能在學校附近租屋，依靠付費或家長支援工作，但清醒時間仍多半耗在校園。因此，赴外求學的中學生在求學期間往往多年足不出戶。能進入北京或上海頂尖大學，本身已是成功故事。

許多旅居加拿大的受訪者同樣在中學階段開啟教育移民之路，其軌跡與中國境內移民相似。然而不同於考入北京或上海頂尖大學所附帶的榮耀，入



讀加拿大大學作為成功標誌的意義則模糊得多。許多四年制大學本科生要麼高考成績不佳，要麼刻意迴避高考。在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省，唯有中產或富裕家庭能負擔全額教育開支。因此當地經濟條件較差的研究生常需邊讀書邊打工。成本考量與移民潛力驅使受訪者選擇加拿大。除階級攀升外，受訪者更常提及個人發展是移居加拿大的動機。

> 邊緣實踐與永久本地身份的策略構建

中國低技能勞動力移民無法像教育移民那樣寄望於社會向上流動。中國各地政府需要廉價勞動力，卻不願讓移民成為永久戶口持有者。儘管戶口制度的重要性已有所減弱，但它仍關乎若干關鍵的終身權益，包括子女的教育權利。

相對地，成功取得學歷的移工雖享有較優渥的本地戶籍途徑，卻仍面臨中國頂尖大學與城市的多重門檻。即便成功取得戶籍，大城市戶籍持有者仍常嘲諷這些移工的專業技能與超高考試成績。

有別於加拿大教育移工，中國教育移工畢業後無需本地戶籍即可合法留居北京或上海，僅需具備工作與住所證明。而耐人尋味的是，由於北京戶口僅賦予公務員特權，對私營企業求職者則並非首要優待目標。與低技術移民不同，他們深知優質私營企業職位——而非戶口——才能提供私人醫療保險與養老金。本研究中亦發現，本地戶口身份主要影響的對象為有子女的移居畢業生，而我訪談的許多對象皆另有規劃。

相較之下，對在加拿大的中國教育移民而言，無論出於就業前景、情感紐帶或逃離性暴力，永久居留權都是長期居留的關鍵。理論上，根據加拿大國際流動計劃，「國際學生」確實能獲得一條通往永久居留權的獨特途徑。然而，現實中的申請歷程卻充滿變數。加拿大積分制度的頻繁調整與近期錄取名額的縮減，往往會危及精心規劃的永久居留計劃。此外，為爭取額外積分以獲取永久居留申請邀請，受訪者常從事當地低技術、不穩定的臨時工作。在畢業與獲取永久居留申請邀請期間，初期加拿大工作經驗對後續轉入更穩定職位至關重要。本研究中，除了一位受訪者為外，其餘受訪者皆在華人經營企業找到首份本地工作，此類企業鮮少要求加拿大工作經驗。部分雇主本身亦為新移民。常見職類包含服務當地華人社群的專業服務，如學生教育諮詢、移民服務或餐飲業工作。

> 結論

國際與國內遷移的研究皆與教育移民的經歷息息相關。綜合研究顯示，國家邊界並非移民面臨的重要障礙核心，權力不平等才是關鍵因素。中國戶口制度不僅劃分鄉村與城市、不同層級的城鎮，更將低技能者與受過教育者割裂開來。加拿大永久居留權（而非最終公民身份）使教育移民陷入不穩定的就業狀態，常見於社區企業。此外，常態的不穩定性更使他們追求穩定當地身份的過程複雜化。■

來信寄至：

Feng Xu <fengxu@uvic.ca>

> 柬埔寨成衣業移工： 危脆性與抗議

Tsz Chung Lai 與 Kaxton Siu，浸會大學，香港。



柬埔寨農村移工參加勞工權益培訓課程。
照片拍攝：Kaxton Siu。

2024年3月9日，約600名受雇於中資持有之永旺成衣公司（Y&W Garment Company）的柬埔寨農村移工，徒步遊行至勞工與職業訓練部。他們遞呈一份請願書，要求忽然宣布破產並導致工人拿不到最後一個月工資的公司持有人，補發遭拖欠的工資和津貼。當日下午，該部發佈聲明，要求工人、法律代理人、當地工會以及其餘利害關係人立刻結束抗議，並指控他們阻礙交通、造成堵塞。該部建議工人們透過合法管道尋求救濟，並強調了「維持公共秩序及保護更廣大社群的利益」之重要性。

永旺成衣公司的忽然破產以及伴隨的欠薪，鮮明地揭示出柬埔寨成衣業農村移工在外資格局的演變中所面臨的危脆境況（precarious conditions）。同時，工人的集體抗議不僅暴露了他們的弱勢，也顯示了他們在剝削加劇與不安全感升高的情勢下動員並展現其能動性的能力。中資持有之公司的迅速

擴張，以及相應的諸如此類的工人抵抗，迫使勞動社會學與工業社會學追問：在中資壓倒性的進駐下，柬埔寨成衣業農村移工的當下處境為何？重要的是，工人們如何回應那些由不良工作條件及經濟不確定性所造成的挑戰與艱難？而柬埔寨政府對此所採取的立場又為何？

> 工人的多面向危脆性

當檢視柬埔寨成衣業農村移工的當下處境之時，多重及交叉的危脆形式變得明顯。根據我們在2023至2024年對分別來自28個成衣工廠的86名工人進行的問卷調查，顯而易見地，這些工人正面對著嚴重的職業不安全感，這種不安全感是由僅足以維生的工資（每月204美元）、泛濫的短期契約（其中有66%的工人簽訂六個月或更短的合約）以及無所不在的年齡歧視（超過四十歲的工人特別容易遭到裁員或排除）等因素所驅動。工廠經常在訂

單短缺期間強制執行輪換停工，每月支付工人的工資低至 40 美元，進一步固化其財務不穩定及不確定性的循環。這一行業深入地嵌入於買家驅動的全球價值鏈，使國際品牌得以將需求和生產之波動的風險轉嫁到那最微弱的人身上：即工人們。

危脆性遠遠超出工廠大門之外，塑造了移民模式及家戶生存策略。77% 的工人是農村移民，雙收入對生存來說至關重要：75% 的已婚夫婦共同居住在首都金邊（Phnom Penh），但其基本生活開銷（雙人每月 300 美元）超過了一般工資。為了應付之，許多家庭將孩子留在家鄉（37%），依靠祖父母的照護，並在危急時刻需要反向匯款；而有 31% 的工人從農村家庭獲取支助。債務是普遍而嚴重的（取中位數 4250 美元），通常以土地為抵押，侵蝕了工人的長期保障，並由於工資一直無法滿足基本需求，加深營養不良和代際貧窮的循環。這些債務源於新冠疫情期間的就業不足，以及工人們在金邊的高成本環境中努力維持生計所致。此外，一些農村移工會借錢購買摩托車及汽油以便往來於城鄉之間，特別是那些將孩子及長輩留在農村家鄉的人。

> 威權資本主義與柬埔寨官方回應

柬埔寨政府對永旺成衣公司之抗議活動的反應體現了柬埔寨政府在勞資關係方面的威權轉向。透過將示威視作對公共秩序的威脅，國家預示著對勞工行動主義（labor activism）的收緊控制，同步於區域性的威權資本主義趨勢：經濟增長與外國投資優先於勞工權利與民主參與。

雖然柬埔寨農村移工具有一個集體抵抗的歷史，他們行動的空間卻已經大大地縮減。根據 Better Factories Cambodia 的數據，罷工行動從 2013 年的 147 起急遽下降到截至 2018 年 8 月僅剩 9 起，而工作日損失從 889,000 天下降至 42,000 天。提交給仲裁委員會的勞資糾紛從 2016 年的 248 起下降到 2017 年的 50 起。這種下降與其說表明了勞資關係的改善，不如說是國家系統性鎮壓的結果：逮捕公會領導人、恐嚇運動人士，以及將公會拉攏為政府的夥伴，特別是自 2013 年大選以來。

工人組織的法律框架正在逐步被侵蝕，對爭端的獨立解決越來越少。政府的修辭——強調「公共秩序」和「社群利益」——旨在掩蓋一個更深層次的現實：國內外資本的利益優先於工人的福祉和權利。

> 危脆性與抵抗之可能

永旺成衣公司的抗議活動為柬埔寨成衣業農村移工在威權資本主義下的多重危脆性及受限的能動性提供了一個窗口。在中國投資推動經濟增長並創造就業機會的同時，它也鞏固了一種近乎完全由工人承擔風險和不安全性的系統。截至 2024 年 10 月，中國資本約占了柬埔寨 2236 家工業工廠 54.7% 的所有權，代表了驚人的 90.86 億美元的投資。最引人注意的是，中國投資者現在控制著柬埔寨大約 90% 的成衣廠。

這一戲劇性的轉變表明了中國從「世界工廠」向全球領先之投資者的演變。中國國內勞動力成本的上升促使中國公司將生產轉移到柬埔寨等國家，因那裡的低工資提供了明顯的競爭優勢。中國資本在柬埔寨關鍵產業中的支配地位迫使柬埔寨國家政策更傾向於資本利益。這一傾向——從其壓制勞工行動主義和強調「公共秩序」的作法中顯而易見——進一步縮小了集體談判和工人主導變革的空間。

然而，柬埔寨農村移工的復原力已然存在。他們抗議的意願、對家庭和社區網絡的依靠，以及為公平工資和體面條件而進行的鬥爭，都表明了強大的抵抗精神。前進的道路將需要新形式的團結和倡議——包括柬埔寨境內和境外——以應對全球資本主義和威權統治所造成的日益深化的危脆性。柬埔寨的案例活生生地提醒了我們，在全球化世界中，工作的未來將由資本需求與工人爭取尊嚴、安全和正義的鬥爭之間的持續競爭所塑造。■

來信寄至：

Tsz Chung Lai <22482261@life.hkbu.edu.hk>

Kaxton Siu <kaxton_siu@hkbu.edu.hk>

> 戰爭作為糾纏的累積： 加薩案例研究

Guilherme Leite Gonçalves, Rio de Janeiro State University, 巴西。



圖片來源：Markus Winkler，
由Pexels提供。

法律學者對當代社會戰爭新模式提出關鍵看法。其中，Masato Ninomiya在Festschrift中撰寫的章節，將國家復仇、種族滅絕與殖民主義三種視角相互連結。然而在特定資本主義發展條件下，當過度積累的財富受未來收益的主張驅動，並於金融化背景下催生開拓新市場的壓力時，這些過程便可重新被解讀。此觀點汲取Karl Marx、Rosa Luxemburg 與Hannah Arendt的思想，後經土地掠奪理論(Landnahme-Theorem)的論辯重新詮釋。該觀點主張：受時空限制制約的資本主義增長，透過暴力、殖民政策與戰爭佔領非資本主義領土以突破藩籬。關鍵在於如何解讀此現象在近期軍事衝突中的體現——此問題必須置於金融積累體系中加以審視。

基於貨幣產權與付息償還義務的計息資本，在次級市場中其轉化為虛構資本，藉此建立收入流預期，並透過資本化的潛能來實現收益倍增。此體制透過投資合約的形式，過度積累對未來剩餘價值的索償權，其實現取決於將領土與人口併入價值循環的徵用行動。此類併入將剩餘資本導向基礎建設、住房與資源開採，同時藉由土地及不動產資產擔保的證券創造收入流。

由此觀之，巴勒斯坦的毀滅正是交織式戰爭積累的極端案例。

> 以色列已成為全球資本的戰略樞紐

正如威廉·I·羅賓遜與阮懷安所指出的，2003年伊拉克戰爭爆發之際，中東地區正加

速融入全球經濟體系——此前大阿拉伯自由貿易區(GAFTA)成立，並簽署了多項雙邊與多邊協定。這催生了由海灣資本(數兆美元主權財富基金)支持的跨戰略領域企業與金融投資浪潮，同時伴隨來自歐洲、美洲及中國的資金流動。以色列遂成為全球資本的戰略樞紐。

在此背景下，加薩封鎖可被理解為跨國過度積累的手段——這種積累已透過以色列企業複合體顯現，如今正尋求新的價值化疆域。此舉實為原始積累的體現：透過剝奪土地、財貨與人民，將其轉化為市場導向的社會關係。

> 恐懼恐怖主義與緊急狀態為國家復仇鋪路

此種剝奪權力之舉，奠基於暫停權利保障的基礎上，使軍事機器得以在缺乏制度制衡與保障機制的情況下部署。此項暫停措施仰賴法律機制(緊急狀態)予以授權。如最上所闡述的「國家復仇」概念，精準捕捉了此種轉變：國家對針對人民或財產的政治性暴力行為，其回應已不再受法律約束，而是由報復驅動。

哈瑪斯襲擊後，班傑明·納坦雅胡承諾「**強大復仇**」，並援引經文「**要記住亞瑪力人對你所作的**」，此經文常被解讀為報復的指令。此種框架透過「**恐懼主義**」的論述訴求煽動恐懼以獲取正當性。當主流意識形態將社會恐慌常態化，並為失衡的國家復仇行為背書時，民眾的不安全感便被持續放大。國防部長約阿夫·加蘭特宣稱對加薩實施「**全面封鎖**」——「斷電、斷糧、斷水、斷油」——此舉已成為集體懲罰與飢餓戰術的象徵。 >>

> 重現歐洲殖民主義的邏輯

國家復仇主義的意識形態建立在「恐怖分子」的污名之上。它作為一種他者化機制，將暴力、野蠻與非理性等特質歸因於特定群體，從而使其成為壓迫的正當目標。此種機制同時維繫著自詡「文明」社會中優越的道德自我形象。由此觀之，反恐戰爭重現了歐洲殖民主義的邏輯——當時以種族與民族的等級制度為依據，為對殖民地人口實施「文明使命」與壓迫統治提供正當性。在此脈絡下，約阿夫·加蘭特將巴勒斯坦人描述為「[人獸](#)」的言論，正呼應了殖名企劃中典型的去人性化話語。

國家復仇的殖民本質使當代戰爭淪為滿足金融過度積累價值提升需求的工具。污名化他者的論述授權暴力行徑，助長對領土與人民的掠奪，其極端形態體現於以色列-巴勒斯坦衝突中——內塔尼亞胡的極右翼民粹主義正激進化[埃蘭·卡普蘭](#)所指認的賈博廷斯基修正主義殖民軍事主義遺產。它挪用宗教與自然法論述來建構猶太人凌駕於阿拉伯人之上的優越性，推動一種種族主義殖民主義，徹底封閉平等共存的可能性。此框架使加薩戰爭得以在種族清洗的指令下實施國家復仇，為針對巴勒斯坦人的種族滅絕行為鋪路。這場暴力服務於解決資本過剩的方案，援引諸如「[無主地](#)」等學說——主張被視為「空置」或「未利用」的土地可供殖民——藉此為滅絕與重建正名，從而促成新投資與資產增值。

> 領土殖民與軍事化積累的交織

據《[富比士](#)》報導，中東局勢升級期間，國防類股創下歷史新高，主要受大型軍火供應商合約帶動，進而重燃軍工產業熱潮。這種軍事化積累與其他形式的資本增值相互纏繞。2024年10月底，在轟炸聲中，以色列向跨國能源公司頒發地中海油氣勘探許可，企圖在烏克蘭戰爭加劇的能源危機中將該國打造成天然氣樞紐，此現象如[羅賓遜與阮氏](#)所揭示。

此後，領土殖民化、極右翼民族主義與金融過度積累的導流機制已顯露交織痕跡。加薩重建計劃中，以色列政府提出的《加薩2035》與約瑟夫·佩爾茲曼提交給川普團隊的《加薩重建經濟計劃：BOT模式》皆主張建立國際治理與安全機制，以促進外國投資者對公共資產的私有化進程。

正如[努爾·阿拉菲](#)和[曼迪·特納](#)所指出的，美國計劃宣稱該地區「不存在財產法」，並以此為基礎將其租賃五十年，投資者將獲得「加薩地區的股權」，並全面掌控經濟、基礎建設及行政管理。相較之下，《加薩2035》則將重建與開發加薩能源

儲備（約122兆立方英尺天然氣及17億桶石油）掛鉤。兩項計畫皆預設巴勒斯坦人將遭驅離：BOT計畫要求加薩「徹底清空」，而以色列方案則構想「從零重建」。兩者均提供持續軍事力量以確保外部政治控制，並推動符合投資者利益的經濟重組。

> 在加薩，巴勒斯坦人陷於暴力與經濟依賴的夾縫

2025年10月9日第一階段停火協議達成後，關於加薩重建的爭論勢必加劇。川普提出的[二十點和平方案](#)主張成立由巴勒斯坦參與的行政機構，表面標榜技術官僚性質，實則政治上服從於由美國總統主持的「和平委員會」——該委員會成員包含托尼·布萊爾等新自由主義秩序的歷史推手。該計劃承諾倖存巴勒斯坦人將享有「自由離境與返鄉」的權利，並推出「激活加薩」經濟倡議：此乃吸引投資的早期框架綜和體，以「中東蓬勃發展的現代奇蹟城市」為藍本（第9、10點）。慶祝停火時，[川普](#)宣稱：「加薩將逐步重建……該地區蘊藏著驚人財富。」

加薩戰爭揭示了破壞與重建的糾纏積累如何催生出剝奪、金融化與殘存民眾間的複雜互動。[奧爾瓦·斯維塔特](#)指出，對種族滅絕暴力的抵抗重申了群體或社群與土地的紐帶，驅動著反收奪的抗爭；而作為殖民技法的「經濟價值化」雖促進公民融入，卻僅限於分層的以色列公民身份體系——這種體系在戰後情境下更顯歧視性。在重建區域，拆除行動與死亡人數攀升之際，卻伴隨著經濟繁榮的承諾。如此一來，糾纏積累將巴勒斯坦人困於暴力與對重建工程本身的經濟依賴之間。■

來信寄至：

Guilherme Leite Gonçalves

<guilhermeleite@iesp.uerj.br>

